

西藏的经济形态及其对区域 间人口迁移的影响

长期以来,国内外有关西藏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历史、宗教、传统文化、西藏与中央政权关系、西藏与英、印关系等领域^①。相比之下,对西藏经济形态的专门研究要少得多。直到近年来,由于改革开放和注重经济发展,中国学者对西藏经济的研究才逐步加强起来^②。不言而喻,分析和理解西藏的经济,研究它的发展形态和演变过程,对于理解西藏的社会、政治、民族关系、文化和宗教是极为重要的。举民族关系为例,民族矛盾时常与各族之间的经济矛盾有关,各民族集团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资源占有、贸易交换)时常以民族矛盾的形式体现出来^③。在不少情况下,宗教集团拥有自己的经济利益并且积极参与经济事务^④。

①英文文献请参见:L·W·Pye,1975.“China:Ethnic Minorities and National Security”,in N. Glazer and D. P. Moynihan, eds.《Ethnici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第489页至512页;J. T. Dreyer,1976.《China's Forty Mill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 T. Grunfeld,1987.《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New York: M·E. Sharpe; M. Goldstein,1989.《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②黄万纶编著,1986年,《西藏经济概论》,西藏人民出版社;李竹青,1990年,《西藏经济的发展与对策》,民族出版社。关于国外学者对西藏经济问题的研究著述,请参看黄万纶《西藏经济概论》,第36页。

③N. Glazer and D. P. Moynihan, eds. 1975.《Ethnicity》.Cambridge:Harvard Univ. Press. 第8页。

④M. Weber,1963.《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Boston:Beacon Press. 第223页。

在人口现象方面，不同民族聚居区之间的人口迁移常常受到地区之间经济关系的影响^①。经济作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活动，对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正因为经济如此重要，为了对西藏自治区的整体情况有个完整的了解，为了解西藏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是如何影响西藏的人口问题和民族关系，很有必要将西藏自治区的经济形态、西藏经济活动过去和现在的主要特点详细地加以分析，并把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如人口迁移和汉藏关系）放到西藏整体的社会、经济变化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来进行研究。

本文力求回答四个主要问题：（1）现代西藏经济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在1951年以前西藏与内地是怎样一种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又如何影响着西藏的人口迁移（在本文中主要指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迁移）和民族关系？（2）近三十年来西藏的经济发生了哪些变化？现在西藏自治区的经济有哪些主要特征？近三十年西藏经济的变化又如何影响了人口迁移和民族关系？（3）1959年以来，中央政府在西藏的经济活动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4）形成西藏“民主改革”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经济形态的原因是什么？这两种经济形态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由于住在西藏自治区以外各省的藏族长期处于所在地政府的管辖之下并已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当地经济生活之中，所以这篇文章所研究的范围将仅限于西藏自治区。本文引用的材料和数据主要取自以下几个来源：（1）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和人口普查结果；（2）1949年前后国内有关西藏研究的出版物；（3）由西藏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西藏研究》杂志和中国藏学出版社编辑的《中国藏学》杂志所刊登的文章；（4）有关西藏研究的英文出版物。应当说这篇文章所参考的研究文献是很不完全的，特别是藏文的有关文献由于作者的语言问题未能包括。由于西藏的统计机构建立较晚，有些基层统计人员缺乏经验，一些读者可能会对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和普查数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提出质疑。但是，这些数据是我们目前所能得到仅有的关于西藏的全面和系统的社会经济数字，从最低限度而言，这些数据至少可以反映出西藏经济和人口迁移的基本情况和变化的大趋势。作为对西藏经济研究的一个尝试，本文仅只试图为西藏经济基本形态勾画出一个粗略的轮廓，并为今后的研究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理论假说。

一、研究的理论框架

在参考了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间人口迁移的有关文献之后^②，我们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

①G. F. De Jong and J. T. Fawcett, 1981. "Motivations for Migration". in G. F. De Jong and R. W. Garder, eds.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NY: Pergamon Press.

②J. Goldlust and A. Richmond, 1974. "A Multivariate Model of Immigrant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8): 193-226; R. P. Shaw, 1975. 《Migration: Theory and Fact》. Bibliography series No. 5. Philadelphia: Region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M. P. Todaro, 1985.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3rd edition). London: Lonman; N. Hansen, et al. 1990. 《Regional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NY: Plenum Press.

用以对假设的影响两区域居住的两民族集团之间经济关系、人口迁移和民族关系的诸因素进行综合分析(见图一)。在这个分析模型中,我们假设两个区域(西藏自治区和汉族地区)之间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例如土地所有制和行政体制)和文化方面(例如语言和宗教)的差异对于两区域间行政与社会交流、经济交流(资助和贸易)和人员往来(官员和商人的流动、劳动力的迁移)等方面交流的内容和程度均有影响。一些研究表明,区域间在经济体制上的重大差异会在相当程度上限制其间的人口迁移和贸易往来。人们通常不大愿意迁往一个在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语言习俗等方面与自己所习惯的文化很不相同的地区。同时制度和语言的不同也会给区域间的商业贸易带来许多障碍^①。

除了直接的影响之外,区域间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于贸易和人口迁移还可能有一些间接的影响:这些差异会影响地方政权和社区对于区域间贸易和人员往来的态度和政策,而这种态度和政策又可以直接促进或阻碍贸易和人员交流。这些间接影响也在分析模型中用箭头标志出来。

在对其它地区(如内蒙古)进行调查时,我们发现当两个地区的地理条件(海拔、湿度、自然资源等)和生存条件(食物、居住条件等)很不相同时,这些自然因素对区域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会有消极影响。此外,两地区间如交通很不方便,贸易往来和人口迁移数量也会因此而受到限制^②。我们假设这种情况在西藏同样存在。

此外,一个地区所能为迁入者提供的经济机会(农村的自然资源如耕地、草原、森林、矿藏等及与此有关的劳动机会;城镇的就业机会)会直接影响迁移者的“潜在”迁移动力。较高的就业和致富机会将刺激更多的移民迁来。对于那些自发流动而非政府组织的移民来说,更是如此。

区域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社会联系和经济交流的程度——历史上和现时——对于区域间的人口迁移也有直接的影响。这些关系又最终体现在有关的政策规章中,所以在图一中,我们把这些关系用“国内政策影响”来表示。以不同地区为聚居地的两个民族之间总的关系如何,又受两个地区的行政、社会、经济、文化交往的情况和人口迁移所造成的结果的影响。当民族有自己的传统居住区域并构成该区人口的大多数时,民族集团之间的关系与相关的行政区域之间的关系,往往相互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外国政府的有关政策作为一个中介的“干扰”因素(an intervening variable)也可能对一国内部某个区域(如西藏)的行政权对与其它区域(如内地各省)进行贸易和人员往来的态度和政策产生直接的影响。这类现象在欧洲列强在亚非拉地区推行殖民主义政策时期是司空见惯的。此外,通过自己与另一国的某个地区或几个地区的贸易活动(政策可能是相似的,也可能区别对待),外国政府和经济集团也可能对该国内部区域之间的贸易发生影响。如英国向西藏倾销商品,占领市场,对西藏与内地的贸易是有消极影响的。同样,区域之间的贸易情况也会影响各区域与国外贸易的成交额。因为市场有自己的规模而且其发展速度是有限的,满足市场的商品来源地(地区或国家)的结构会因贸易政策和

^①S. Findley, 1977. «Planning for Internal Migration». ISP-RD-4.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②Ma Rong, 1992. «Migrant and Ethnic Integration in Rural Inner Mongolia» Boudler; Westview Press.

价格的变化而变化。

以上的这些理论假设都作为分析变量包括在图一的模型中，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主要方向都用箭头逐一标出。本文将借助西藏的资料对这些变量（影响西藏经济发展、影响西藏与内地关系的主要因素）进行逐一讨论和综合分析，看看这个模型在多大的程度上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和有助于说明西藏的发展过程。下面几部分的讨论都是围绕这些变量展开的。由于有关汉族地区的研究已经很多了，所以本文的重点将集中在西藏自治区。

美国社会学家赫克托（M·Hechter）在研究了英国凯尔特人（Celts）之后，对于一个国家在发展本国经济过程中，经济较发达的多数民族聚居区和较不发达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之间的关系，提出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扩散模式和内部殖民主义模式。扩散模式，“（Diffusion Model）”，是指在各民族拥有平等权力的条件下，“核心地区”（经济发达的多数民族聚居区）的社会和经济结构逐步扩散到“边远地区”（经济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并使“边远地区”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方面达到“核心地区”的水平。

内部殖民主义模式（“Internal Colonialism”）则是不同的导向：它的实质是“核心地区”对“边远地区”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就像帝国主义国家对待殖民地一样，但其对象是国内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在“边远地区”有时也会逐步发展起一些采矿业和加工业，但主要是为了向“核心地区”提供资源或提供某项出口商品^①。赫克托在详尽地研究了英国的案例之后，认为从历史到现时，内部殖民主义模式比扩散模式更符合和更能解释英格兰与凯尔特之间的关系。这个分析思路和两种发展模式，对近十几年来欧美的民族研究特别是民族现代化发展研究有很大影响。作为一个宏观的社会发展理论，我们在分析西藏自治区与其它地区之间关系时，也将予以参考。

二、1952年以前的西藏经济

在研究其经济形态之前，我们先简要地介绍一下西藏自治区的基本情况。西藏自治区的面积为123万平方公里，位于中国西南部平均海拔高度为3600米的高原上（图二）。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字，全区总人口为220万^②。西藏传统的藏传佛教对政治体制（1959年民主改革前）、文化教育、人民生活有很深的影响。1951年，根据中央政府和西藏噶厦政府代表签署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③，解放军进入西藏，1959年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叛逃印度之后，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度和“政教合一”的原噶厦政府。

为了理解1952年以前西藏经济的基本形态，下面将从几个方面进行讨论：主要经济活动、经济组织形式、生产力水平、与其它地区的经济关系、产品和收入的分配、财富的消费以及发展经济活动的动力。

^①M. Hechter, 1975. 《Internal Colon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第6页至第8页。

^②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1991年，《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

^③《协议》全文参见《西藏自治区概况》编写组1984年编《西藏自治区概况》，西藏人民出版社，第626至629页；英文参见P.P.Karan, 1976.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Lexington: Univ. Press of Kentucky. 第89页至91页。

1. 生产和贸易

(1) 农业和牧业生产。农业和畜牧业是西藏传统的主要经济生产活动。“农业生产约占四分之一，牧业生产占四分之三。”^① 农业提供青稞、蔬菜以供食用，用青稞加工而成的糌粑是藏族的主要食品。畜牧业在食品方面可以提供奶食和酥油，皮革和羊毛是农牧民做衣服的材料，同时也为本地手工业提供原料，畜产品还可用于与其它地区进行贸易。拉萨河谷（平均海拔3500米，气温为摄氏4—10°）是西藏最重要的农业区，其它农业区大多分布于各个河谷。西藏的主要牧区位于北部和西部，海拔很高（4600米以上），人口稀少，大片地区属“无人区”（参见图三）。西藏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和人口的发展。

根据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近年公布的数据，1952年现自治区所属地域内的耕地为245万亩，粮食总产量为155335吨^②，西藏生产的主要粮食种类是：青稞、碗豆、燕麦等。据吴忠信四十年代的报告，当时青稞约占全部粮食产量的70%，碗豆占20%，其它共占10%^③。运进西藏的大米和面粉主要供给贵族、富人和汉商的消费之用，数量很少。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西藏的人口约为115万（其中西藏噶厦政府自报人口一百万，昌都地区人口为15万）。1952年西藏人均粮食产量约为135公斤^④。所以可以大致说在五十年代以前，西藏的粮食生产是处于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为补充谷物的不足部分，在西藏与尼泊尔、锡金等国交界处，藏族居民用湖盐和畜产品与境外交换谷物等商品^⑤。

1952年西藏约有970万头（只）牲畜，其中牦牛225万头、绵羊470万只、山羊250万只^⑥。这些牲畜的大多数位于北部的牧区。要估算当时畜产品的年产量是十分困难的，不过贸易方面的统计数字表明畜产品是西藏用以与其它地区进行交换的主要产品。

(2) 运输与通讯。西藏的交通运输过去十分落后，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来说，在直至五十年代，“世界上没有其它地方像西藏那样，仍然没有带轮子的交通工具，……许多世纪以来，西藏的全部运输工作都是用人驮或兽驮来完成的，”“主要的河流上都没有桥梁”^⑦。通讯方面也同样落后。五十年代初，拉萨只有一部小电台供政府使用，电话、邮政的公共服务直至五十年代末才在西藏建立起来。

(3) 手工业。按照现代标准，西藏在1952年以前可以讲没有工业生产，手工业是西藏的主要非农产业。《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表明在1952年西藏社会劳动者总数中只有6%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活动^⑧。西藏主要的手工业产品为：氍毹、卡垫、帐篷、木碗、靴子、

①黄万纶，1986年，《西藏经济概论》，第155页。

②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编，1989年。《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第211页至218页。

③吴忠信，1953年，《西藏纪要》，台北：中央文物出版社，第113页。

④同本页注②，第133页。

⑤李竹青，1990年，《西藏经济的发展与对策》，第170页。

⑥同本页注②，第233页。

⑦P. P. Karan, 1976,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第50页。

⑧同本页注②。第133页。但这页的图表并没有说明如何把喇嘛在行业上加以分类。从事非农产业劳动者人数在社会劳动者总数的比例从1952年的6%增加到1990年的13%（《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91），第134页）。

刀子、珠宝首饰等^①。除了本地生产的皮革、羊毛、木材之外，西藏手工业所需原材料（棉布、丝绸、金属等）主要依赖于区外进口，来自邻近的汉族地区或印度和尼泊尔。

（4）商业。除了许多手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之外，西藏的大部分日常生活用品（如茶叶、棉丝织品、陶瓷器、工业制品等）都从外地输入。许多世纪以来，“茶马贸易”是西藏与邻近各省（四川、云南、甘肃）货物贸易的主要形式^②。西藏从四川输入茶叶、棉布、丝绸、白银和糖，云南则主要向西藏提供茶叶和铜^③。西藏向这些地区输出的货品主要是羊毛、皮革和麝香。

在西藏的贸易活动中，汉商扮演了重要角色。许多世纪以来，西藏与邻近汉族省份的贸易在其贸易总额中一直是第一位的。清朝时期在拉萨的汉商有二千多户^④。本世纪初驻成都的英国领事霍集估计内地运藏物资总值每年超过白银一万两，同时西藏与内地的贸易额是西藏与印度贸易额的四倍以上^⑤。由当时西藏摄政热振经营的“热振昌”和云南的“恒盛公”商号合作曾一度控制了四川输往西藏的茶叶贸易，年运入藏茶叶一万包^⑥。可见当年西藏与内地之间贸易活动的兴旺。

与此同时，西藏与印度和尼泊尔的贸易也是西藏与区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亚东海关的档案，在1895—1898年期间，西藏输往印度的羊毛每年约544吨^⑦。在四十年代，尼泊尔商店在拉萨约有150家^⑧。根据当时的条约，英属印度政府在拉萨和江孜都设有贸易机构。

在1952年以前，外国政府对西藏的贸易活动影响很大。自从本世纪初荣赫鹏（Younghusband）率英军入侵拉萨之后，英国对西藏的影响大大加强，亚东海关的纪录表明西藏与英属印度之间的贸易随之有了飞速的增长。西藏输往印度的货品价值从1889年的131548卢比骤增到1902年的805338卢比，西藏从印度进口货品价值从1896年的561395卢比增至1899年的962637卢比^⑨。根据亚东海关纪录，进口多于出口，印藏贸易中西藏是有逆差的一方。以

①《西藏自治区概况》编写组，1984年。《西藏自治区概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第478页。

②据《明史》卷80《食货》篇，汉藏地区的茶马贸易始于唐朝。中华书局，1974年版。关于唐代以来的汉藏茶马贸易情况，参见黄万纶，1986，《西藏经济概论》第94—99页；黄大泉，“汉藏茶马贸易”《中国藏学》，1988年第四期；赵毅，“明代的汉藏茶马互市”，《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

③鲁子健“清代藏汉边茶贸易新探”，《中国藏学》，1990年第3期；陈汛舟，“略论历史上川西北地区的藏汉贸易”，《中国藏学》，1990年第3期。

④洪涤尘，1936年，《西藏史地大纲》，南京：正中书局。第43页。

⑤黄万纶，“英俄对藏经济侵略的历史考察”，《西藏研究》1982年第2期。PP. 51—58。

⑥陈汛舟、陈一石，“滇藏贸易历史初探”，《西藏研究》1988年第4期，PP. 51—58。

⑦黄万纶，“英俄对藏经济侵略的历史考察”，《西藏研究》1982年第2期，第49页。

⑧吴忠信，1953年，《西藏纪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第112页。

⑨印度卢比在1900年升值。在1897年，1卢比=0.196美国金元；在1898—1899，1卢比=0.207美元金元。1900年，1卢比=0.324美国金元；（《The World Almanac and Encyclopedia, 1898—1900》）。卢比的升值表明以卢比以计算单位的印藏贸易在本世纪的增长比贸易金额的增长更具实际经济意义。

1899年为例，西藏从印度进口962637卢比，出口为822760卢比^①。另根据英国官方统计，直至1902年以前，在印度与西藏的贸易中基本上是西藏出超，印度入超^②。但两方面的纪录都表示印度（英国）与西藏地区的贸易在19世纪后半叶发展迅速。

在1899年西藏向印度出口的货物（822760卢比）中，主要是畜产品：羊毛（占总额的70.7%），牦牛尾（5.2%），骡马（3.9%），羊皮（1.7%）。这些畜产品占出口总额的81.5%。麝香是另一项大宗出口商品，占总额的14%^③。所以，可以说西藏当时可供出口的主要是畜产品和麝香。

1911年辛亥革命后，由于达赖喇嘛在国外势力的煽动下有争取西藏独立的倾向，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恶化，西藏与内地的贸易也随之急剧下降。在之后的一个时期内，政治关系成了西藏与内地贸易的最重要的因素。当时的一个报告估计，在三十年代，西藏输往印度的货物每年约为1500吨，输往汉地的仅为500吨^④。

2. 1952年以前西藏的社会和经济制度

在1952年以前，西藏在耕作技术方面十分落后的农业（广泛使用木犁、用牦牛踏场脱粒）需要养活一百多万人口，其中十分之一以上是喇嘛^⑤，同时要供养一支数万人的军队^⑥和近千名官吏^⑦。政府和寺庙需要拿走农民和牧民绝大部分的产品去供养数目众多的僧侣、贵族、

①黄万纶，“英俄对藏经济侵略的历考史察”，第84页。

②黄鸿钊，1991年，《西藏问题的历史渊源》，香港：商务印书馆，第33至34页。

③黄万纶，“英俄对藏经济侵略的历史考察”，第49页。

④陈汛舟、陈一石，“滇藏贸易历史初探”，第55页。

⑤在1958年，据统计西藏有114103个喇嘛，而在历史上（1737年）曾达到316231个喇嘛，占当时总人口的35%，（参见刘瑞编《中国人口：西藏分册》。1989年，中国财经出版社。第298页和第35页。）另外一个研究认为1737年的喇嘛数字仅是黄教僧侣，各派僧侣的总数实际上已近总人口的半数（王森，1984年，《中国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93页）。达赖喇嘛则宣称在五十年代西藏有25万个喇嘛（法国《费加罗报》，1982年10月5日）。

⑥陈健夫认为西藏政府在三十年代即有六千常备兵（参见1937年，《西藏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第134页）。吴忠信1940年出使西藏时，根据西藏政府提供的资料向中央报告藏军约6500人（吴忠信《西藏纪要》，第75页）。丹增、张向明主编的《当代中国的西藏》也认为“1950年，藏军有6500人左右”（《当代中国的西藏》（上），第111页）。其它西藏方面的来源指出仅1920年藏军就招募了15000名新兵。（M. Goldstein, 1989.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第84页）。黄万纶著《西藏经济概论》认为“解放前西藏常备兵额，原约为六、七千人，后陆续增加，全部军力……约二万人左右”（第236页）。在1947—1950年期间，当时西藏政府收入的一半用于支付军费（《西藏自治区概况》，第344页；《当代中国的西藏》（上），第112页）。

⑦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西藏政府约有200名俗官和230名僧官（T. Grunfeld, 1987.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NY: M.E. Sharpe. 第9页。）以上关于喇嘛、军队、官员的数目，不同来源的数字相差很大，仅供参考。

官吏和军队，去维持几千个寺庙耗资巨大的宗教活动和政府的日常开支。在当时十分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唯一能够使这个社会如此运转的制度只能是残酷榨取的农奴制。

农奴制在西藏的实行已有许多世纪了^①。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至少在公元700年以前，西藏即广泛地存在着奴隶制^②，又于13世纪初叶，普遍确立了农奴制^③。农奴主可以大致分为政府官员、贵族和寺庙（实际上是上层僧侣）三个部分，也被称作“三大领主”，他们拥有西藏几乎全部的耕地、大部分牲畜以及农奴。表一是1959年西藏耕地的占有情况。表中拥有0.3%耕地的自耕农主要是居住在与内地相邻的边界地带。毫无疑问，当时绝大多数藏族农民都没有自己的耕地。

云南地区是西藏主要的农业区之一（见图三），表二所表示的是1961年“民主改革”以前山南地区人口的“阶级构成”。农奴主仅占人口的0.4%，加上农奴代理人共占5.9%，他们是绝大部分社会财富的拥有者。富裕农奴占总人口5.5%，他们被称“差巴”，多数从属于封建地方政权，领种差地，虽受领主剥削并有人身依附关系，但自己有农具耕畜。“中等农奴”占总人口的22.1%，在支应领主差役租税后可勉强维持温饱。“贫苦农奴”占人口的47.4%，加上没有丝毫人身权利的奴隶，共占人口的59.1%，构成西藏社会最基本的阶级。其它来源也提供了类似的西藏阶级构成：贵族（5%）、僧侣（15%）、牧民（20%）、农奴（60%）^④。

从表二看，未划阶级的牧民加上手工业者、小商人和游民共占7.4%，加上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山南地区的“自由人”仅占总人口的13.3%。一方面占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奴和奴隶过着贫苦的生活，被当做“会说话的牲口”，在生产劳动中是被动的甚至是被强迫的；另一方面，极少数领主占有几乎全部财产，骄奢淫逸，也不会关心生产的改进和发展。所以，“在寺庙和贵族拥有的那些大庄园里，封建领主们忽视生产也未能推动耕地的实质性改进，这就造成了持续许多世纪的农业衰退。”^⑤

3. 寺庙在行政和经济中的角色

1952年以前的西藏是一种“政教合一”的体制，喇嘛们在政府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西藏政治现象中最不寻常的是它的双重体系：每个俗官都有一个相应的僧官。”^⑥不仅达赖喇嘛是西藏最高的统治者，噶厦政府中的首席噶伦和各“基巧”的首席长官也都明确规定必须由僧官担任^⑦，每年春季举行法事活动时，拉萨市政直接受哲蚌寺喇嘛的管辖，宗教集团实际上控制了整个西藏政府和社会。

①参见M.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第3—6页。

②《旧唐书》卷196, 《新唐书》卷216, 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参见黄万纶编著, 1986年, 《西藏经济概论》, 西藏人民出版社, 第75页。

④T. Grunfeld, 1987.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第13页。

⑤P. P. Karan, 1976,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第81页。

⑥同本页注④, 第9页。

⑦“基巧”相当于目前的“地区”。首席噶伦和基巧首席官必须僧侣担任是十三世达赖执政时的规定（《当代中国的西藏（上）》，第104页）。

西藏的大寺庙都有自己的武装并在历史上经常卷入到权力斗争中去^①。西藏的文明，包括哲学、艺术、医学、天文、文学等等都是围绕着藏传佛教而发展起来的。许多世纪以来，教育也主要是由寺庙来承担的^②。访问拉萨的人最深的感受即是其强烈的宗教气氛，似乎整个社会的活动都是围绕着宗教而展开的^③。1952年，拉萨城镇人口为37000，其中16000喇嘛^④。

寺庙的经济势力在西藏也非常强大。西藏和平解放前，实耕地约300万藏克，寺庙占有39.5%^{8a}。1959年拉萨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共占有土地18435英亩，十一万头牲畜和四万多农奴^⑤。一般情况下，寺庙所属的农奴要把收成的70%以上交给寺庙^⑥。寺庙不仅拥有庄园、牧场、农奴和手工业作坊，同时还从事商业和放贷。所有的大寺庙都有自己专门的商业机构（Lab-rang）^⑦。川西藏族地区寺庙有专职的经商喇嘛，称“涅巴”或“纪娃”。“在阿坝藏族中有二万多喇嘛，其中纪娃就有一千多人”，占喇嘛总数的5%^⑧。寺庙参与贸易活动的程度也可以从他们囤积货物的情况反映出来。如1959年定日县协格寺囤积的茶叶，足够该寺消费九十年，这些茶叶实际上是该寺为其贸易活动而囤积的货品^⑨。

放债和高利贷是寺庙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据不完全统计，达赖喇嘛自己的放债机构1950年放债藏银303.9万两，年息10%^⑩。哲蚌寺历年放出高利贷粮食累计达一亿六千万斤，银元一亿多元，债息收入占全部收入的25%^⑪。寺庙放债的利率，“借钱一般在30%；借粮的年息是‘借四克还五克’（25%）”^⑫。寺庙高利贷的利率“一般年息为30—50%，小额的高达100—150%”^⑬。虽然寺庙收入很多，但各寺庙提供给普通喇嘛的食物等却是十分有

①参见《西藏自治区概况》，西藏人民出版社，第309页。

②直到1950年，在西藏“没有为民众开设的学校，年轻人受教育的唯一地点是寺庙”（Karan, 1976, 第13页）；在拉萨也有过几所私人学校，但主要是为贵族子弟开设的（M. Goldstein, 1989, 第7页），关于四十年代西藏教育的详细情况，请参考吴忠信的《西藏纪要》（第90—94页），刘瑞编的《中国人口：西藏分册》（第301页），和《当代中国的西藏》（下），第300至302页。

③F.S.Chapman, 1940, 《Lhasa: the Holy City》。London: RR Clark.

④《人民日报》，1991年4月17日。

8a同上页注⑦，第244页。仅哲蚌寺就拥有185个庄园，两万农奴，300个牧场和16000牧人（M. Goldstein, 1989, 第34页）。

8b“北京中国藏学讨论会概述”《民族研究动态》，1992年第1期，第31页。除寺庙占有39.5%外，噶厦直接经营30%，贵族占29.6%，这些数字与表一的1959年数字略有出入。

⑤黄万纶，“论西藏民主改革的几个问题”，《西藏研究》1984年第4期，第12页。

⑥C. Bell, 1928. 《The People of Tibet》Oxford: Clarendon Press. 第125页。

⑦陈讯舟“略论历史上川西北地区的藏汉贸易”，《中国藏学》1990年第3期，第77页。

⑧周本加，“西藏民主改革前的寺庙经济”，《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第44页。

⑨《西藏自治区概况》第284页。

⑩况浩林，“近代藏族地区的寺庙经济”，《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第145页。

⑪《西藏自治区概况》，第285页。

⑫同本页注⑧第44页。

限的^①。由于寺庙和喇嘛们经常从进香者那里得到大量布施，普通喇嘛们实际上靠布施生活。如哲蚌寺一年的布施收入有藏银6200秤（1秤=50两），粮食1100克和酥油8500克（1克=28市斤）^②。这些布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农奴和牧民。当他们将自己劳动收获的大部分付给农奴主、政府之后，再将另一部分产品贡献给寺庙，所剩下的就仅仅是维持基本生存而已，他们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什么资金来进一步发展生产。

一些文献和研究谈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收入和用途。1795年呈报清廷的报告说“布达拉宫每年除收实物外，各项收入折合银两合计约127000两”；但每年支出为143600两，仅正月和二月份念经办法事一项就需79000两，不足部分都由清廷补足^③。扎什伦布寺每年收入“实物（本色）、折色约合银66900两，计每年用度约需银74600余两”^④这些政教合一的政府机构，宗教活动开支浩大，入不敷出。

贝尔（Charles Bell）援引西藏地方政府1917年财务报告来分析西藏的收入与支出。是年拉萨噶厦政府收入为72万英镑，布达拉宫收入为80万英镑，噶厦政府又从自身的收入中拿出27.4万英镑给布达拉宫^⑤。政府拿出收入（来自税收、放债和政府拥有的庄园、牲畜等）的一部分给寺庙，这一现象也存在于基层行政权。“一般估计，各宗（相当于县）政府送交寺庙作为宗教费用的实物，要占全宗全年收入的50—60%”^⑥。可以说布达拉宫和大小寺庙既从自身的领地上征收财物，又从政府和朝香者那里聚敛了大量财物，是西藏财富的最大拥有者和最大消费者，寺庙的宗教活动耗费掉了西藏有限物质财富的主要部分。

4. 1952年以前西藏经济的主要特征

1952年以前西藏地区经济的主要特征可以大致概括如下：

（1）西藏的经济基本上仍然是使用人力、畜力和简单工具的传统农牧业经济，可以说没有现代工业、交通和科技的应用，商业和手工业也处于很不发达的阶段（小型手工作坊、街头摊贩、人畜力运输），城市化的水平也很低^⑦。

（2）在人口较密集的平原和河谷地区的农牧业由三大领主（政府、贵族、寺庙）所控制，生产以领地庄园为单位，实行的是农奴制，同时存在着少量的奴隶。在人烟稀少的高原牧区，三大领主的控制较弱，一些部落甚至仍然处于原始氏族社会阶段^⑧。

（3）西藏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同时出口羊毛和其它畜产品以换取茶、棉

①M. Goldstein, 1989年, 第34至35页。

②黄万纶, “论西藏民主改革的几个问题”, 《西藏研究》, 1984年第4期, 第12页。

③吴忠信, 《西藏纪要》第85页。

④张羽新“清代前期西藏地方经济长期停滞落后的原因”, 《西藏研究》, 1983年第2期, 第35页。

⑤C. Bell, 1946. 《Portrait of the Dalai Lama》London: Collins. PP. 165—166.

⑥周本加, “西藏民主改革前的寺庙经济”, 《西藏研究》, 1985年第2期, 第43页。

⑦1958年, 城镇人口占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70%, 大部分城镇人口居住在拉萨（刘瑞编《中国人口：西藏分册》，第184页）。

⑧在这些部落, 基层行政权（乡）直至1985年才首次建立（《人民日报》1990年7月9日）。

布、金属和其它日用品，用以满足日常消费和农业、牧业和手工业对于生产工具和原料的需求。

(4) 宗教集团(上层喇嘛)拥有极大的权势。在五十年代喇嘛为总人口的10%和城镇人口的半数^①。寺庙控制着政府以及社会的经济活动，拥有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大量的牧场以及许多农奴和奴隶。

为了进一步理解西藏经济的性质和社会生产的目的，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西藏的物质财富是如何使用的。除了一小部分农牧业产品是用来维持生产者(农奴和牧民)的基本生存外，通过种种渠道集敛起来的财富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1) 耗资巨大的宗教法事活动。每年元月和二月的法事活动要耗去布达拉宫年收入的62%^②。在1958年，西藏有2711座寺庙^③，每座寺庙里都有无数盏酥油灯，每年单是这些酥油灯日夜耗去的酥油数量就十分惊人。

(2) 供养喇嘛。在五十年代，平均每两户要供养一个喇嘛^④。西藏地方政府收入的半数以上也提供给寺院。

(3) 寺庙的建筑和像象。寺庙征集的金银大量地用于铸造佛像和转世活佛的灵塔。这些佛像和灵塔用金箔包裹并缀满了宝石和珍珠^⑤。许多的寺庙的建筑规模十分宏大，便如哲蚌寺在1951年约有一万名喇嘛，有房屋上万间^⑥。

(4) 维持西藏的政府和藏军。由于近半数的政府官吏是喇嘛，俗官的薪俸主要由分派给他们的庄园提供，1952年以前西藏的行政预算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政府的收入半数给了寺庙，另外一半用来支付军费。“(西藏地方)政府的大部分收入不是用于政府的活动而是宗教的法事。^⑦”

在西藏，不仅寺庙在从事宗教活动，行政机构最关注的也是宗教活动。在1952年以前，宗教在经济和人们的生活当中占据统治地位，寺庙(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社会的经济，社会各阶层的生产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供给寺庙的消费。因此，1952年以前的西藏经济，可以称作是广义的“寺庙经济”或“宗教经济”。这种“宗教经济”与庄园农奴制和政教合一

^①在五十年代，拉萨约有5—6万城镇人口，除2万居民外，都是喇嘛(刘瑞，《中国人口：西藏分册》，第69页)。

^②参见吴忠信，《西藏纪要》，第85页；张羽新，“清代前期西藏地方经济长期停滞落后的原因”，《西藏研究》，1983年第2期，第35页。况浩林，“近代藏族地区的寺庙经济”，《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第146页。

^③刘瑞，1989，第298页。另据1737年造册统计，黄教寺庙达3477座(张羽新，1983年，第34页)。

^④刘瑞，1989，第298页。在18世纪，每户需要供养2.5个喇嘛(张羽新，1983年，第34页)。

^⑤依照这一传统，为了修建十世班禅的灵塔，中央政府拨了600公斤黄金和500公斤白银，同时拨出6400万元修建一个33米高的宫殿来安放这个灵塔(《中国西藏》，1990年，春季号)

^⑥M. Goldstein, 1989. P25.

^⑦M. Goldstein, 1989. P. 85.

的政治体制紧密相联，构成了1952年以前西藏以宗教和宗教集团为核心的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社会结构。

国外有些研究很精辟地把1952年以前的西藏社会与欧洲的中世纪相比较。二者都是“宗教完全控制了广大民众，欧洲基督教会和西藏佛教寺庙的宗教组织在两地的社会和政府中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欧洲的中世纪时期之后是文艺复兴，在西藏却没有发生类似的文艺复兴，格鲁教派的组织和（历代转世的）达赖喇嘛继续维持了一个寺庙的王国，从1578年直至…1951年。^①”

5. 1952年以前西藏与汉族地区的关系

1952年以前，汉族地区与西藏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关系即是在以上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建立与发展起来的。一方面，西藏的地理特点（高原）和交通条件（四周多山）使得西藏与其它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十分困难。另一方面，由于汉族地区的“地主——佃农”制度与西藏的农奴制很不一样，如果汉族农民进入西藏，他们既不可能从庄园主那里租到土地，也不愿意把自己变成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此外，汉族地区实行的是一种多元的宗教体系：道教、大乘佛教、基督教等等和平共存，宗教组织对于行政的影响很小，这与西藏政教合一的体制也很不一样。这些在自然条件、社会制度、土地制度、宗教角色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长期以来限制了汉族地区与西藏的人员往来和经济贸易。

由于西藏的社会、经济、文化体制与内地很不一样，加之运输、通讯条件恶劣，清朝政府治藏政策的目标主要是维护西藏对中央政权的从属地位和版图的统一，并抵御外敌对西藏的侵犯。这就是驻藏大臣和清朝拉萨驻军所担负的主要任务^②。

在经济方面，一些研究认为“进贡与回赐是元、明、清三朝西藏与中央政府的主要经济关系。^③”例如，清政府每年把四川打箭炉等地税收五千两银子、大批茶叶赏给达赖，布达拉宫开销中的不足部分均由清廷补足。据《西藏记》，清政府对西藏“免其正赋之贡，”“凡所纳税赋及向罚人银钱，俱存备公用并喇嘛念经之费。^④”即是说，清朝政府是可以在西藏征赋的，但出于扶助喇嘛教和安抚地方的考虑，予以免征。

驻藏大臣也有责任协调西藏与内地的贸易，这些贸易有时需要行政干预。例如乾隆时期西藏通过驻藏大臣到云南购铜，云南总督不准西藏入境买铜，驻藏大臣报告后，乾隆对云南总督给予申斥^⑤。

除了每年的进贡与回赐之外，西藏与内地的贸易也十分繁荣。连英人贝尔（C. Bell）

①P. P. Karan, 1976. P. 12.

②根据历史记载，西藏自元朝起就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1963年，三联书店，第41—52页；《西藏自治区概况》第111页）。一些西方学者指出，至少“自十八世纪初第六世和第七世达赖的动乱年代之后，对于西藏臣属于满族统治的中国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M. Goldstein, 1989. P. 44）

③黄万纶，1988年，第13页。

④张羽新，1983年，第32页，第35页。

⑤陈汛舟、陈一石，“滇藏贸易历史初探”，《西藏研究》，1988年第4期，第53页。

也承认汉族地区是西藏的主要贸易伙伴^①。内地与西藏的贸易金额要超过清廷对达赖的赏赐，所以对汉藏贸易在汉藏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辛亥革命后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曾一度恶化，西藏与内地的贸易额虽然大幅度下降，但许多货品的交换仍然维持着。例如1929至1938年期间，仅从云南一个县（佛海）销藏茶叶每年仍在一万担以上^②。

尽管路途崎岖，高寒缺氧，当时在西藏（特别是拉萨）居住着一些汉族和其它民族（满族、回族、蒙古族等）的成员。他们包括（1）中央政府的官员们和驻军（1911年以前约有2千多人）；（2）城镇中的商人；（3）手工艺人和园丁^③，（4）佛教僧侣。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始终维系着西藏与内地的行政、经济和文化联系。

西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受内地的影响很大，西藏对内地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则相对较小。藏传佛教为蒙古族和满族所尊崇，但占内地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信奉的是大乘佛教，两者之间虽然有着很深的渊源，但毕竟属于不同的教派。加上去过西藏的内地人数目很少，西藏对于汉族地区的居民始终是一块神秘的土地。

赫克托（Hechter）提出的“扩散模式”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上面所总结的西藏在1952年以前的这种情况与他所描述的“扩散模式”的第一阶段显得很吻合。“核心地区与边远地区事实上是彼此隔绝的，发生在核心地区的事对于边远地区只有轻微的影响，……两地区在它们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机构方面有着许多深刻的差异^④。

三、1959年以后西藏经济的主要变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昌都战役之后，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代表们通过谈判于1951年签署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之后，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政治生活和经济活动中再次成为一个关键因素。

1952年至1959年期间，西藏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重大变化，但是在当时处于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昌都地区（1961年并入西藏自治区）进行的“民主改革”带来了许多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西藏这个时期统计的工业产值（1956年为171万元，1959年为5331万元）^⑤主要是昌都地区的工厂创造的，西藏全面的深刻社会改革直至1959年以后才发生。

1. 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

1959年达赖及其追随者流亡印度，随后在西藏开始的“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寺庙也失去了对行政权的控制。这是西藏社会几百年来所发生的两项最重要的变化。在“民主改革”运动中，所有的农奴和奴隶都变成自由人，三大领主的土地和牲畜分配给了农奴、奴隶

①“西藏文明与今日的文化主要来自中国和印度，从后者是宗教方面，从前者则主要是物质方面。”（C. Bell, 1928. 《The People of Tibe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 12.）

②谭方之，“滇茶销藏”，1940，《边政公论》第三卷第十一期。

③西藏城镇的蔬菜基本上是由这些汉族人供应的，参见C. Bell, 1928. P. 31.

④Hechter, 1975. P. 7.

⑤《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89），第84页。

和牧人们^①。在1965年至1975年期间，西藏自治区绝大部分农村地区逐步建立起人民公社制^②。在八十年代，西藏像内地农村一样，也开始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和牲畜又重新分配给农民和牧人。1984年以来，在农区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在牧区实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③。从废除农奴制，把领主占有的生产资料分给农奴，到建立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然后是再次把生产资料分到各农户，三十多年来，西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依照内地的形式，行政机构、党团组织、社会团体、城镇居委会组织、农村基层政权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机构也在西藏自治区系统地建立起来。西藏的社会与经济制度与内地的制度渐趋相同，同时西藏也像其它省份和自治区一样时时受到中央政府重大政策变化的影响。在“文化革命”期间，西藏也受到极左路线的破坏；在近年的改革开放中，藏族群众也像其它地区的各族人民一样在发展生产中富裕起来^④。

这个持续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阶段与赫克托（Hechter）描述的“扩散模式”的第二阶段十分相似：通过对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给予平等权力和执行一系列发展计划（教育、医疗、工业生产等等），核心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逐渐“扩散”到边远地区。核心地区与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与以前相比有了极大的发展。而且这些联系与交流是在政府努力推动边区的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2. 1959年以后寺庙在西藏社会中的角色

1959年，许多喇嘛追随达赖流亡印度^⑤。随后，西藏的寺庙数量和喇嘛人数明显减少。在1958年有2771座寺庙和114103个喇嘛，到了1960年只剩下370座寺庙和18104个喇嘛^⑥。在“文化革命”后的1976年，西藏只有8座寺庙和800个喇嘛^⑦。

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政府重申了宗教自由政策并为“文化革命”中造成的错误和损失予以平反和补偿。许多寺庙得以重建，喇嘛人数也迅速增加。在1986年，西藏已有234座寺庙和6466喇嘛。最新的统计表明在1990年西藏已有34680名喇嘛，喇嘛人数在四年内增长了五倍多^⑧。近年访问西藏的外国人士注意到，宗教目前不仅在

①对于参予叛乱的三大领主的财产和土地，政府采取没收并分配给农奴的作法；对于未参予叛乱的领主、代理人的财产和土地，政府实行赎买政策，赎买后分配给农奴。关于赎买金总数和赎买标准，请参看《当代中国的西藏》（上），第291至292页。

②《西藏自治区概况》第455至459页。

③《当代中国的西藏》（上），第413页。

④M. Goldstein and C. M. Beall, 1990. 《Nomads of Western Tib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⑤据估计1959年流亡印度的约5万至5万5千人，其中5千至6千是喇嘛（T. Grunfeld, 1987. P. 187）；另一估计认为1959年有9万多藏民流往国外，从西藏地区流出者约为7.4万人（张天路，《西藏人口的变迁》，1989年，中国藏学出版社，第10页）。

⑥“1964年，中共西藏工委同意西藏各地共保留寺庙563座，留寺僧尼7000人”，（《当代中国的西藏》（上），第315页）。

⑦刘瑞，《中国人口：西藏分册》，第298页。

⑧《人民日报》1991年1月17日。

农牧民当中，并且在包括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中，又有了广泛的影响^①。

由于近十年的新政策，西藏农牧民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1990年西藏农村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为447元，是1978年收入的2.6倍^②。虔诚信教的农牧民们因而也就能给予寺庙和喇嘛更多的布施。1988年一个调查表明在拉萨寺庙中的喇嘛们每人每年平均得到的布施为1000元至1300元。这大约是农牧民收入的三倍。近年寺庙里关于佛经的研读比1959年以前要松懈得多。可以得到高收入而又不必参加生产劳动，甚至也不用苦读经书，这可能是西藏的年轻人之所以愿意当喇嘛的原因之一。由于政府对于正式注册的喇嘛每月给“津贴”，对寺庙定期给补助^③。财政支出方面的考虑也是政府之所以要限制喇嘛数目的原因之一。

1959年后，寺庙失去了在行政事务和经济事务中享有的传统权力：失去了全部的庄园、农奴、奴隶和在政府中的显赫位置。但是随着喇嘛人数的重新增长和宗教影响的逐步扩大，寺庙和喇嘛们希望恢复往昔的权势是十分自然的。在目前的政治结构中，这种企望和努力很显然是西藏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

3. 生产

1959年以后，西藏的经济和城乡景观在许多方面已经完全改变了。首先是修建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公路网（1990年为2.17万公里），1990年西藏拥有2.5万辆汽车和7133辆拖拉机^④。其次，西藏自治区拥有的农业机械马力接近了全国平均水平，1990年达到四亿五千万瓦或人均208瓦^⑤。第三，化肥及其它增产技术现在在西藏已经普及（1990年人均使用化肥16公斤）。随着运输条件的改善、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其它技术的应用，西藏的农业产值在过去三十年中增长了四倍。

表三是西藏工农业主要产品的增长情况。耕地从1952年的245万亩增加到1990年的334万亩。粮食亩产从1952年的80公斤增长到1990年的211公斤，人均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135公斤提高到1990年的292公斤^⑥。牲畜也从1952年的972万头（只）增长到1990年的2251万头（只），人均10.3头（只）^⑦。农牧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

随着在西藏逐步引入汉族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政府也一直在积极推动西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努力发展西藏的现代工业。1959年以后，在西藏迅速地建立了一批工厂。但三十年来西藏工业的发展却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起初是想简单地仿效内地建工厂的办法来发展西藏的加工业，没有认真考虑到西藏当时的现实情况和发展现代工业的困难：能源匮乏、运输成本高、缺乏熟练工人等等。在这之前，西藏几乎完全没有像样的工业，既没有基础设

^①D. E. MacInnis, 1989. 《Religion in China Today》. New York: Orbis Books. 第187页。

^②《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91），第370页。

^③这种“津贴”与内地寺庙里和尚的“津贴”相似，而且津贴如同行政干部工资一样有等级。对于寺庙的补贴则类似行政部门的日常经费。

^④《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91），第241页。

^⑤同本页注^④，第151页。

^⑥同本页注^④，第163页至第170页。

^⑦同本页注^④，第173页，西藏1980年达到牲畜头数的最高峰，为2351万头（只），牧区人均牲畜22.3头（只），农区人均5.6头（只）。（《西藏自治区概况》第463页）。

施也没有与现代教育联系在一起的产业工人。所以，许多工厂开工之后马上开始亏损并成为当地政府的财政负担。西藏国营企业的工业产值虽然在1960年曾达到1.42亿元，到1968年就降到0.11亿元。通过长期的调整和改进，工业产值在1990年也仅仅达到2.35亿元^①。

与工业的发展伴随而生的问题是工业生产的亏损逐年恶化。在1985年，每1元工业投资带来0.45元亏损。由于工业投资的这种负效果，西藏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入沿海省份^②。资金从经济落后而且似乎缺乏资金的地区流向经济发达、资金充沛的地区，从宏观政策上似乎不合理，但这恰恰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因为资金在那儿可以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如何使西藏的产业结构更趋合理、更符合西藏目前在能源、原材料、技术、管理水平、工人素质、市场发育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真正提高其吸收建设资金的能力和效益，而不是简单地依靠政策倾斜和国家补贴，是西藏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否则，资金既使通过计划渠道拨到了西藏，还是会遵循其“避免亏损、追求利润”的经济规律流到其它地区。

1952年以前，西藏与内地相隔绝，另有一套政治、经济制度。1959年后的情况则完全改变。经过一系列体制变革后，西藏在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方面（行政体制、生产组织、资金渠道、科技信息、物资供应等等）与其它地区已渐趋相同。内地政治、经济体制向西藏的“扩散”已完成。按照全国的平均标准，西藏在经济生产水平上仍然是中国最不发达的地区，但是与1959年以前的情况相比，西藏的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4. 收入与社会福利

自从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以来，西藏人民的收入有了显著的提高。国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852元增加到1988年的2739元，年平均福利费（包括医疗、劳保、退休金等）从1983年的161元增加到1988年的583元^③。1988年，全国国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为1810元，福利费为537元^④。同年西藏城镇居民的年平均收入为1211元而全国城镇居民的年平均收入为1192元。1990年西藏国营企业职工年均工资为3224元，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284元^⑤。虽然西藏经济落后、工业亏损，西藏的国营企业职工和城镇居民的收入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由于西藏的主要城市是拉萨，拉萨的城镇居民中汉族占一定的比例（在1990年拉萨地区总人口中，汉族占28.9%^⑥），而收入资料并没有按民族进行统计，所以我们很难讲抽样调查得到的西藏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藏族城镇居民的收入情况。不过由于被调查的（在西藏有正式城镇户口的）汉族绝大多数在国营单位工作，我们可以猜想西藏的汉族的平均收入要高于藏族城镇居民。

1985年，西藏自治区农村人口的年平均“纯收入”为353元，同年全国农村人口的年平均

①同上页注④，第195页。

②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11页。

③《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89），第499页。

④《中国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89），第101页至151页。

⑤《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89），第521页；《中国统计年鉴》（1989），第726页；（1991），第120页。由于有关城镇居民收入的统计是依赖于小样本量的抽样调查（在西藏样本量仅100户），所以有关数据仅供参考。

⑥《西藏拉萨市城关区第四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汇编》，1990年，第284页。

“纯收入”为398元，1990年西藏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47元，全国农村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为630元^①。改革深入开展的这五年里，内地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比西藏农村要快，内地与西藏农民收入的差距在扩大。但是，如果考虑到西藏农牧民享受到广泛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甚至政府提供补助）^②和其它各项福利，西藏农村人口的收入与全国水平的差距会比以上数字所反映的要小一些。根据国家统计局对我国各地区1989年居民消费情况的调查统计，西藏农民的人均消费为412元，非农业居民为2078元。西藏非农业居民（城镇人口）的消费水平高居全国之首，第二位是上海（2045元），第三位是广东（1707元），北京非农业人口的消费只有1368元。但西藏农民的消费水平在各省区只居中游，远远低于广东的772元^③。说明西藏的城乡收入差距要大大超过全国的平均城乡差距，在西藏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这是一个不应忽视的重要因素。

如果我们仅就财富和收入来看，目前西藏可以说大致接近于赫克托（Hechter）描述的“扩散模式”的最后阶段：边远地区人民的收入在逐渐接近核心地区人民的收入。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本质的不同：“扩散模式”的理想形态是边远地区实现了工业化，自身的财力日趋雄厚并能支持当地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而西藏工业的发展水平依然很低而且严重亏损，居民收入的提高是凭靠中央财政补贴而达到的，而不是靠本地经济的切实发展。

5. 商业：西藏与其它地区的经济贸易

表四是西藏自治区1978年至1990年期间商品零售额的增长情况。这里有四点值得注意：

（1）消费品销售额比生产资料销售额的增长要快得多（前者增长了5.3倍，后者为3.1），这说明西藏经济的发展使其逐渐变得更像一个消费单位而不是一个生产单位，消费及消费水平的增长大大超前于生产和经济的发展。

（2）城镇地区与农村的销售额基本上是同步增长（前者增长了4.7倍，后者为5倍）。西藏的城镇近三十年发展得很快，但与农区相比，城镇产生的经济效益却很小，城镇中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国营的工业、商业、建筑业等）大部分是亏损的，西藏城镇的消费特征十分明显。

（3）社会集团^④购买的消费品价值在十二年间增长了11.5倍，个人购买的消费品仅增长了4.2倍。政府部门及有关的团体机构的职员仅占西藏总人口的7%，但这些机构购买了1990年全部售出消费品的31%。而全国社会商品零售出的消费品当中，社会集团购买的仅占10%。“集团消费”现象在西藏表现得十分突出。由于这些消费品中有很大大比例分配给单位

①《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91），第373页；《中国统计年鉴》（1991），第296页；（1991），第 页。农村人口的“纯收入=年总收入-生产成本-税收-固定资产折旧-承包定额-（统计局农调队支付的）调查补助”（《中国统计年鉴》（1989），第759页）。

②“凡进入公办小学以上学校的藏族等少数民族学生，直至大学毕业，绝大多数人的学习生活费用基本上由国家包下来。从1985年起，对部分重点中小学和边境沿线地区中小学实行‘三包’（即包吃、包穿、包住）”（《当代中国的西藏》（下），第311页）。

③《中国统计年鉴》（1991），第272页。

④“社会集团”在统计上是指由政府支付费用的企事业单位，用以与个人购买者相区别。

职工，加上这些机构的职员们以个人身份在商场上购买的消费品（不统计在社会集团购买数中而计入“个人购买”），这些机构团体职员们的消费水平实际上是相当高的。

（4）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新政策，集体和私人经济在西藏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1987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集体和私人商业所经营的占42.6%。1990年，个体商业商品零售额占西藏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20.8%^①。

从表五中我们可以发现西藏从内地其它省份运进的商品额增长得非常快，从1955年的710万元增长到1990年的70175万元。而西藏运往其它省份的商品仅从1959年（对外输出的第一年）的80万元增加到1990年的4988万元。西藏与其它省份进出口的贸易差额在1990年达到了65187万元，出口仅为进出口总额的6.6%。

关于西藏与其它省份进出口贸易的货品结构，可以参见表六。运输方面的统计表明粮食和油料是西藏输入的两大项：食品和能源。日用消费品（工业产品、布匹、糖等等）和“分配物资”（即是由政府部门购买后通过非商业渠道分配给有关机构的物资，如建筑材料、机器设备等等）是另外的两大项。畜产品和传统药材（麝香、虫草等）如同1952年以前那样仍然是西藏输出的主要商品，但自1980年中央对西藏实行新政策以来，畜产品的输出明显下降。与之相比，铬矿石和木材近年在西藏的输出中开始占有一定比重。

在1955年至1983年期间，从内地进口的物资占在西藏自治区商品销售总量的82%。这个比例在1983年这一年达到了94%，1990年西藏自治区国营商业从区外调入的商品总额甚至超过该年区内销售额（参见表五）。西藏与内地贸易的巨大倾斜有时也被人称作是“单向供给”、“输血经济”或者是“用中央政府的钱去买中央政府的商品（实际上是各省区的产品）来维持西藏的经济和消费。”^②民主改革以后三十年，西藏始终必须依赖内地提供的能源、原料和商品以维持生产和消费，而且这种依赖性越来越大。

6. 西藏的对外贸易和旅游业

1959年后西藏与国外的贸易一度下降，外国对西藏经济的影响力如同其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一样，变得微不足道。对外贸易额（1962年以后主要是与尼泊尔）在西藏与其它地区的贸易总额（包括与内地各省区的贸易）中仅占很小的份额^③。在1988年，西藏的对外贸易总额为1.52亿元（其中进口0.23亿元，出口0.6亿元，还有约0.7亿元的边境贸易^④）。而1985年西藏与内地各省区的贸易就达到10.26亿元。近年旅游业有所发展，旅游业收入从1980年的130万元增加到1988年的2662万元，但在西藏自治区该年总财政收入中仅占2.6%^⑤，近年内

① 《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89），第29页；（1991），第313页。

② 王小强、白南风，1986年《富饶的贫困》，第109页；同时参见王小强、白南风、卢小飞、李冬冬，1986年“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稍步实施，振兴西藏”，《农村·经济·社会》第四卷，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第103页。

③ 关于1952年以后西藏对外贸易额、贸易对象和商品种类，参看《当代中国的西藏》（下），第186至187页。

④ 《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89），第458页。

⑤ 《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89），第462页。

尚难以成为西藏经济的一个支柱^①。

7. 西藏自治区政府的收入与开支

与生产的缓慢增长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西藏自治区政府财政赤字的迅速增长。从表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工业、商业和粮食部门（从其它省区购粮和消费品，在西藏出售）是西藏的亏损大户。在1988年以前，企业的亏损一直高于税收和各项地方收入的总和。直至1990年，地方企业亏损和地方收入（主要是税收）才接近平衡（参见表七）。

与此同时，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开支一直迅速增加。1990年，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地方收入仅为1810万元，支出却高达12.92亿元。没有中央政府该年的10.31亿元的财政补助（占西藏总收入的98.6%）^②，西藏自治区政府和西藏的经济简直就无法运转。1952年至1959年期间，西藏政府的收入中有89%是中央政府的补助，在六十年代，这个百分比增至84.3，在七十年代增至106.7^③，在1980年至1988年期间为105.7%。

仔细地分析一下西藏财政赤字的来源，会有助于我们理解西藏经济在1959年以后所形成的新特征。表八是西藏各年支出的构成。在1960年至1990年期间，行政支出增长了10.7倍^④，文教单位（包括教育、医疗、科研、体育等）支出增长了48倍^⑤，支援农业的经费增长了51.6倍。

西藏财政赤字的来源之一是行政开支。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数目增长很快，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从1959年的40487增长到1989年的16万。银行记录说明1990年的现金支出中，“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这一项为3.529亿元，“全民所有制职工奖金”为2675万元（表九）。两项共计3.8亿元，占该年西藏自治区政府总支出的29.4%。考虑到为这些职工提供住房、交通、探亲等等方面的其它支出，用于全民所有制职工的经费在西藏财政支出中所占的份额还要高。

赤字的第二大来源是工业、建筑、运输、商业、粮食等部门，几乎每个部门都有财政亏损。由于西藏缺乏能源（石油和煤）^⑥，缺乏工业原料（金属、棉花、化纤、纸等等），本地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普遍很低、缺乏技术培训，企业管理不善，在西藏发展加工业的成本很高，工厂都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如同中国其它城镇那样，西藏自治区政府也向城镇居民供应低价的粮食、食油和一些其它生产必需品（如煤油、衣服、日用百货等）。这些必需品的价格与内地城镇的国家供应价格相近，但为了将这些商品运入西藏，运费和损耗使得其实际价格与供应价格之间的差额，

①认为西藏旅游业可以适当超前发展，但不能成为西藏国民经济发展的“带头产业”，对“以旅游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指导方针提出疑问（洛绒尼布，“西藏旅游业发展和开发的新思考”，《中国藏学》，1990年第3期，第31页）。

②《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91），第341页。

③这个百分比超过100，说明不但行政、基建、文教卫生等各项支出要中央政府负担，连西藏的生产单位也需要中央政府出钱维持。

④《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89），第470页。

⑤1990年西藏仅教育经费一项即支出1.45亿元（《人民日报》，1991年1月30日）。

⑥西藏虽然有水能资源，但已开发利用的尚不足1%，地热和风力资源的利用也刚刚在起步（《当代中国的西藏》（下），第150页）。

大大高于内地城镇。高价向农民收购农产品再低价卖给城镇居民，是中国政府刺激农业生产同时又保持城镇社会稳定的一贯政策。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这是中国政府财政方面的一大问题。这个问题在西藏更为突出。

首先，自1980年以后在西藏自治区实行“放、免、减、保”四字方针^①，免征农牧业税。这样政府只能在西藏收购到很少一部分粮食，城镇居民所需的大部分粮食只能依靠从内地输入。1985年西藏粮食总产量超过10亿斤，以200万人计，每人平均500斤，应该说可以基本满足区内需要，但1986年粮食商品率仅为4.5%^②。1987年，西藏自治区粮食部门仅从区内收购粮食3万吨，为当年西藏粮食总产量的6.5%，为了保证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同年从区外运进粮食6.6万吨。1990年从区内收购粮食7.2万吨，占产量的12.9%，同年从区外调入粮食22.9万吨^③。

其次，从内地省份运粮要通过火车运到青海格尔木，再由汽车沿青藏公路运进西藏，运程几千公里。1983年内地调入粮食每斤亏损0.28元，调进两亿斤，亏损六千万元，而且占用当年进藏运力的50%。从内地调粮是西藏财政一大负担，甚至与尼泊尔以盐换粮，进口粮价也仅为内地调粮的70%^④。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1977年以来政府“其它支出”的增长：从1977年的364万元增加到1978年的1556万元，又增到1988年的21595万元和1990年的35182万元（见表八）。主要原因是对寺庙及个人在“文化革命”中蒙受损失的补偿（“落实政策”）持续增长。在政府开支中的这一项目“其它支出”，只在西藏统计年鉴中存在，在其它地区（如内蒙古自治区）的统计年鉴中找不到类似项目。这项支出占了1990年西藏全部支出的27.2%，是当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区内收入的19倍。银行记录表明1990年除了工资和奖金以外付给个人的现金（“国家对个人其它支出”）总额达12843万元，银行的这项现金自1975年至1990年增长了18倍（见表九）。

1952年以前作为西藏主要消费集团的寺庙，在1959年后失去了其在社会和政府中的势力。喇嘛的数目也明显减少。然而1959年以后政府机构却逐年膨胀，干部的数目在持续增长。“民主改革”前的西藏有11.4万名喇嘛，近千名官员。1989年西藏有3.5万名喇嘛，而政府部门及有关机构和人员达到16.1万。这些国家职工领取的工资和各项补贴（1989年约为4.7亿元^⑤）占西藏财政总开支的32%以上。结果这些干部（严格说是全民所有制职工）成了西藏的主要消费集团。不同的是，过去的喇嘛集团基本上还是靠西藏自身的经济来供养，现在的国家职工则完全依靠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

大致说起来，中央政府在西藏需要（1）支付行政费用以维持西藏地方政府及所属机构

①即“放宽政策、免征农牧业税、减轻群众负担、农牧产品停止收购后保证城镇供应。”（《当代中国的西藏》（上），第406至407页）。

②李竹青，《西藏经济的发展与对策》，1990年，民族出版社，第44页。

③《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89），第427页和第440页；（1991），第315页和321页。

④同本页注②，第175页。

⑤《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121至135页。

的日常运转；（2）供养16.1万政府干部职工（其中63%是藏族^①）；（3）支付经费以支持和发展西藏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各项社会福利、公共事业和城乡建设，以及投资为城市待业青年创造工作机会；（4）提供经费和物资以促进农牧业发展；（5）维持地方工业的生产，尽管其亏损严重；（6）提供经费重建部分寺庙并向喇嘛提供津贴；（7）提供经费为过去的冤假错案平反，落实“宗教自由”等各项政策，以维护西藏的社会稳定。

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内地的社会与经济制度已“扩散”到了西藏，人民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根据政府统计城镇居民（包括藏族和汉族）的平均收入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似乎西藏已经应该进入“扩散模式”的最后阶段，在这一阶段，“文化差异应该失去其社会意义；……核心地区与边远地区在文化方面渐趋一致，因为作为独立民族意识所赖以生存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基础已经消失了。”^②

西藏的情况看来并没有这么简单。文化差异，特别是宗教差异，在汉族与藏族之间仍然存在，而且在西藏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依然是一个重要因素。试图在西藏发展现代工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遇到了挫折。与人们的预期目标相反，内地的行政和经济体制在西藏的“扩散”还带来了一些没有预料到的后果。

最引人注目的后果是西藏经济在财政上对中央的高度依赖性。中央的补贴按绝对数字讲不算很惊人，每年大约为十亿元，但考虑到西藏的总人口不过是二百万人，人均接受的补贴数就很惊人了。1990年中央政府给予西藏的财政补贴如按西藏自治区人口分摊，每人可摊566元。而1990年全国农业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也不过630元^③。经过了三十年，西藏的行政事务、经济活动、社会运转等等已完全依赖于中央的财政补贴。一些学者在研究拉丁美洲的发展模式以后提出了“依赖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的概念，用以说明一些国家（如巴西）的工业发展和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外的投资^④。西藏的经济目前与其说是“依赖发展”，更不如说是一种“依赖型经济”（Dependent Economy），因为在西藏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只是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因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大幅度提高。

西藏与内地各省区的新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即是在这种“依赖型经济”的模式下发展起来的。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1959年以后的汉藏民族关系和汉藏地区的人员交往、人口迁移也就体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四、在西藏自治区的汉族

1. 五十年代以来汉族的迁入与迁出

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定以后，一些中央政府的汉族官员和解放军部队进入了

①同上页注⑤，第250页。

②Hechter, 1975, 第8页。

③《人民日报》1991年1月17日。

④P. Evans, 1979. 《Dependent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32. 西藏与巴西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像外国财团与巴西本地资本和政府结成紧密同盟一样，中央政府与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密切关系也使之在西藏政治、经济生活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西藏。1954年青藏和川藏两条公路修通之后，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运输条件大为改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于1956年成立，许多汉族干部进入西藏，在筹委会及其所属机构里工作，这一年在藏的汉族干部、职工人数达到了17631人^①。为了避免与达赖政府的矛盾，在考虑到当时西藏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后，中央又决定在1956年至1960年期间在西藏不实行“民主改革”。工作方针和计划的这一转变的结果之一是许多汉族干部离开了西藏，1957年在藏汉族人数减至2100—2200（1500—1600名干部和600名工人）^②，即比1956年减少了88%。

1959年达赖流亡印度之后，西藏的行政部门及其它机构仿照内地的体制陆续建立起来。在西藏各地建立起新的政府机关、医院、学校、商店、工厂、邮局等，汉族人数也随之增加。在1980年，在西藏工作生活的汉族人口为122356（为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6.6%），这是历史上在藏汉族人口最多的时候。

1980年中央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提出在西藏工作的干部和工人应以藏族为主^③。第二年许多汉族职工离开了西藏（参见表十）。随后几年西藏的汉族人口数目逐渐稳定下来，1990年举行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在西藏的汉族人口为81217，仅为西藏总人口的3.7%^④。

2. 影响汉族迁入西藏的因素

西藏与内地在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方面和主要差别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逐渐在缩小，到了七十年代这些体制上的差别可以说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而基本消失。宗教差异的影响也在减弱。发生在西藏的这系列根本性的变化提高了汉族迁入西藏的客观可能性，特别是体制与内地更为趋同而传统文化的保存又相对较弱的城镇地区更有可能吸引汉族移民，西藏自治区对待移民迁入的控制曾经比较放松，特别是在“文化革命”期间更是如此，1976年后曾动员大学毕业生、复员军人、知识青年自愿来藏工作^⑤。但是，事实上三十年来并没有多少汉族迁入西藏。

为什么同一时期汉族移民在其它地区如新疆和内蒙古曾大量出现而没有出现在西藏？新疆和内蒙古是我国除西藏之外的另外两大少数民族自治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汉族人口从1949年的30万增长到1990年的570万。在内蒙古自治区，汉族人口从1949年的520万增长到1990年的1730万^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图一的宏观分析模型，其中是那些因素阻碍了汉族

^①刘瑞，1989年，《中国人口：西藏分册》，第140页。本文讨论的汉族人口数字不包括军事人员。

^②同^①，第141页。

^③1980年8月，中央批转《关于大批调出进藏干部、工人的请示报告》，提出“在进藏的干部、工人中，除留一部分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继续在西藏工作外，大部分内地进藏人员分期分批调回内地工作”（《当代中国的西藏》（上），第437—438页）。

^④需要说明的是，表十统计的人口仅指在西藏有正式户口的人，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口不包括在内。第四次人口普查数字参见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中国第四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1991年。

^⑤刘瑞，1989年，《中国人口：西藏分册》，第142页。

^⑥自然，汉族人口在这两个地区的增长有一部分归因于自然增长即现有人口的生育，但如此成倍或几十倍的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机械增长即其它地区汉族的迁入所造成的。

人口迁入西藏呢？

当我们1988年在西藏各地进行调查时，我向当地的藏族和汉族都曾提出过这个问题。我问他们为什么其它省区的汉族不愿迁来和为什么已经分配到西藏工作的汉族绝大多数都想调走。从了解到的情况看，似乎农村和城镇存在着不同的迁移规律。对于城镇地区来说，干部和知识分子们向我们提供的理由包括：

(1) 几乎所有我们访问的汉族都提出西藏的高原地理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许多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因高原反应和缺氧而生病。为了预防母亲或婴儿在分娩过程中出危险——我猜想一定发生过这样的事，来藏的汉族妇女们都争取回原籍去生孩子并把婴儿留给那里的亲属去照料。许多汉族职工担心如果他们长期在西藏高原工作，退休后回到内地，他们的心脏和其它器官是否能够承受住海拔气压的变化。由于考虑到自己的以及孩子的健康，许多内地的汉族职工不愿意迁到西藏去工作。

(2) 由于西藏的交通条件与其它省区相比仍然很不便利，文化生活也相对比较枯燥，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汉族干部和知识分子们既不能经常回内地探亲又无法消遣时光，时常抱怨在西藏的生活枯燥乏味^①。

(3) 西藏的教育和科技水平比起其它省区来由于历史原因要落后许多。所以年轻的汉族教师、医生、工程师们抱怨西藏不能为他们提供业务上进一步提高的条件。经过一段时间（三或五年）在西藏工作而返回内地以后，他们常常发现他们已被昔日的同学、同事们远远地甩在后面。由于生活和业务发展方面等各种原因，只有极少数的大学毕业生自愿来西藏工作，而已经分配来的也都想走。

(4) 由于西藏各级学校的教育水平较低，许多在西藏工作的汉族职工担心孩子们无法得到良好的教育。出于为下一代争取一个好的教育条件的考虑，他们也在设法调出西藏。

尽管自愿去西藏工作的人数很少，政府还是成功地选派了成千上万的汉族干部职工去西藏。政府的政策和相应的组织措施是安排人员迁入西藏工作的关键因素。当然，这种政府组织的“援藏”工作所涉及的总人数还是有限的，不可能与新疆和内蒙古的自发移民的规模相比。

中央政府各部及所属机构（以及一些省区的有关机构）按照统一计划每年都要派出一定数量的干部、教师、医生和技术人员去西藏工作，在藏工作的年限根据派出年份和工作性质或是三年、或是五年或八年不等。据政府统计，自五十年代以来援藏人员的累计数字约有20万人^②。为了鼓励这些人安心在西藏工作，政府提高了他们的工资级别，允许他们保留在原工作地点的户口，并向他们提供各种补贴^③。在藏工作一年以后，他们可享受全部公费的半年回内地休假，而且许多人经常超假迟归。为了使他们安心工作，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都努力改善他们在西藏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这些援藏人员通常住在单位集体户的大院里，这儿的

^① 参见C. Bass. 1990《Inside the Treasure House》. London: Victor Gollancz.

^② 《人民日报》1991年4月8日。

^③ 1988年夏天，江孜县一位汉族干部向我介绍了他的月工资构成：82（基本工资）+ 5（奖金）+ 23（粮食付食补贴）+ 2.5（洗理）+ 2.5（工龄补贴）+ 7（额外一级工资）+ 80（高原补贴）+ 35（缺氧补贴）+ 11（临时补贴）= 248元。如果他在内地工作，他大约只能得到115元。

住房条件、卫生设施、水电供应等一般都比其它住宅区要好^①。

西藏农牧区的汉族移民为数极少。据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在西藏的汉族在业人员中，只有2.3%是农牧业劳动者^②。相比之下，迁往内蒙古和新疆的汉族移民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从农村地区迁往农村地区的自发移民。这些农业移民大多是在五十年和六十年代迁去的^③。当“文化革命”期间各自治区地方政府的行政控制一度很松的时候，许多原居住地生活贫困的汉族农民迁到了地广人稀的内蒙古和新疆，但这种情况为什么在西藏自治区没有发生呢？我们分析，阻碍汉族农民迁入西藏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是西藏的耕地非常有限。在1952年至1988年期间，西藏的耕地面积从245万亩增加到345万亩，但是由于本地人口出生带来的自然增长，人均耕地同期从2.1亩减少到1.6亩。在所有耕地中，有效灌溉面积只有120多万亩（约为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多一些^④）。由于气温、降雨量、灌溉条件、土地肥力等方面的限制，西藏的亩产（1988年为每亩362斤）不过是邻省四川亩产的一半。据中国科学院综考队不完全调查，西藏只有宜农荒地约20万亩^⑤。西藏在数量和质量（肥力）上都十分有限的耕地不可能为新的农业移民提供就业机会，适合高原生长的作物（青稞）也与内地的作物（小麦和水稻）不同，这些都使汉族农民难以考虑迁到西藏去谋生。

其次，在西藏自治区与人口稠密的汉族聚居地区之间是几个藏族自治州（在青海、甘肃、四川省境内）。与西藏相比，这些藏族自治州的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等与汉族地区较为相近，同时也具有地广人稀的特点。所以当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汉族农民大量迁入内蒙古和新疆的同时，一些汉族农民也向西迁入这些位居汉族地区与西藏之间的藏族自治州。在1953年至1982年期间，在这些藏族自治州居住的汉族人口从42.6万增长到154.1万^⑥。这些自治州在一定意义上发挥了缓冲地带的作用。在“文化革命”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又逐步加强了对人口迁移的控制，迁入这些藏族自治州的汉族人数逐步减少下来。

在1981年至1988年期间，西藏自治区统计的迁入人口总数（包括城乡两部分）为44068人，迁出人口总数为104585人^⑦。这些跨省移民的大多数是汉族，所以可以说近年来在西藏的汉族长住人口呈现了一个迁回内地的新趋向。

西藏的另一个迁移新趋向是城镇中汉族流动与暂住人口的增长。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各项新政策的执行，私营经济（个体商店、摊贩，长途贩运的个体户，修理服务业和手工业方面

①关于汉族在西藏的居住情况，请参看马戎，“拉萨市区藏汉民族之间社会交往的条件”，《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3期。

②刘瑞编，《中国人口：西藏分册》，1989年，第294页。

③马戎，“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和实现迁移的条件——赤峰迁移调查”，《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

④李竹青，《西藏经济的发展与对策》，1990年，第55页。

⑤尚佳莉，“西藏土地承载能力研究”，《西藏研究》1989年第2期，第5页。

⑥关于西藏自治区以外我国藏族人口的地理分布及其变化，参见马戎、潘乃谷，“解放以来我国藏族人口的数量变化及其地理分布”，《中国人口科学》，1988年第2期，第8页。

⑦《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89），第135页。

的个体营业者等)在各地发展起来,政府对旅行的许多限制也取消了。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许多汉族商贩、手艺人、建筑施工队等等来到拉萨和西藏其它城镇寻找机会。他们的人数非常可观,如1988年夏在拉萨市区的汉族流动与暂住人口约有五万人,相当于拉萨市长住居民总人数的40%,所以给访问拉萨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不过他们一般只停留几个月,并没有长期打算。近期据说有些汉族已经承包了郊区的土地种菜卖钱,收入很可观,同时因增加供应而降低了拉萨自由市场上的菜价而受到市民的欢迎。也许将来有一部分汉族暂住人口会渗入到西藏城镇经济的计划外部分而长期留居下来。

由于这些汉族生意人和手艺人大量涌入西藏,对当地的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引发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藏族居民和手艺人的不满情绪。对这方面的情况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并由政府进行规划和引导。从以前情况看,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也无论是政府组织安排的长期援藏工作,还是开放有关限制,允许外省区劳动力作为暂住或流动人口进入西藏,政府的政策和规章制度始终是理解西藏的人口迁移,特别是西藏自治区与内地之间人口迁移的关键因素。

3. 汉族人口在西藏社会经济中的角色

为了分析汉族在西藏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让我们先来看看汉族人口的年龄结构、职业构成和他们在西藏的地理分布情况。

(1) 图四是根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所画的西藏自治区汉族和藏族人口金字塔。藏族人口的年龄结构按其生育水平来说显得比较正常。与之相比,汉族人口的25—29年龄组是人数最多的一组,14岁以下年龄组相对人数较少。很明显在藏汉族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年龄20至34岁的青壮年。由于这些人的迁入西藏是由政府安排并只在藏工作若干年,所以他们把老人和孩子留在原籍而且远在自己年老之前就离开西藏。

(2) 汉族人口的职业构成也与藏族很不一样。1982年在西藏的汉族就业人口当中,生产运输工人占40%,技术人员26.4%,办事人员12.9%,干部9.1%,商业服务人员10%^①。从这些百分比中可以看出,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占汉族的大多数。

藏族人口的87.1%是农牧民,其它职业的百分比为:生产运输工人6.3%,技术人员2.9%,干部1.4%,办事人员1%,商业与服务人员1.3%^②。藏族是西藏自治区农村人口的绝大多数。虽然藏族干部和工人在藏族总人口中的百分比不高,但他们的绝对数字并不小,1988年西藏的干部中藏族有34489名,占总数的61%^③。西藏的藏族职工占全民所有制职工总数的百分比从1959年的43%增长到1989年的63%。

(3) 汉族人口的地理分布特点与上面介绍的职业构成也相吻合。1982年,在西藏大多数县中,汉族人口不超过该县总人口的5%,在过半数的县中,不超过1%。^④在1986年,西藏52.2%的汉族居住在政府机构集中的拉萨市。

由于大多数汉族(不论是政府安排援藏的还是自发来藏的)都倾向于在西藏只居住和工

^①刘瑞,《中国人口:西藏分册》,第294页。

^②同^①。

^③《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89),第169页。

^④马戎,“拉萨市区藏汉族之间社会交往的条件”,《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3期,第58页。

作一个时期，与在其它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汉族相比，他们更倾向于保持自身的文化习俗而较少受本地藏族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影响逐渐加强，城镇里的许多藏族学习了汉语并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汉藏文化融合主要发生在城镇而且以汉族文化为导向。

综上所述，在西藏工作的汉族（长住居民）主要是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他们主要在城镇（特别是首府拉萨）的政府部门、工厂、医院、学校、科技机构等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他们的迁移是由政府组织安排的而且只在西藏工作一段时间。所以西藏自治区不但在财政和物资供应上深深地依赖于内地，在专业技术人员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内地。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图一的分析模型，前面的讨论基本上是围绕着图中的变量来进行的，同时兼顾了历史因素等。讨论的结果说明这些变量在说明区域的行政、经济、文化、人员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基本上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些因素会由条件的变化而弱化，如外国政府（英、印）对西藏政治经济的影响在1951年以前十分重要，而在1959年后，则基本上不发挥作用。但总的来说，这个理论框架有助于我们全面系统地分析区域间关系的现状与变化。

五、西藏1952年前后两种经济形态形成的原因

1. 形成1952年以前西藏经济形态的原因。

本文第二部分在详细介绍了1952年以前西藏经济的各个方面（生产力水平、生产规模、所有制、贸易、消费等）之后，提出一个观点，即1952年以前的西藏经济形态是与政教合一制度相结合的、以庄园农奴制为基础的“宗教经济”。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的话，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西藏能够形成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并能够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西藏僧侣集团的经济和政治势力是逐步扩大的。在赤松德赞时期（公元八世纪）每个僧人都分得了农户而成为农奴主。在赤祖德赞时期（公元九世纪初），赐给僧人寺属庄园，使僧人成为占有农奴和土地的封建领主。正因为僧人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也就产生了为保卫经济基础而争取掌握政权的动机，这是导致出现由宗教教派上层人士掌握政权的“政教合一”制度的重要原因^①。

另外一些研究认为，西藏庄园制的雏型产生于赤祖德赞时期，到了萨迦政权时期（公元十三世纪），西藏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教派力量与豪族世家相结合的地方政权^②。在此基础上，西藏各僧俗首领对其土地和农奴的封建领属关系通过元朝中央政府的分封，逐渐固定下来。这时西藏进入封建农奴制社会^③。到了五世达赖和固始汗统治西藏时期（公元十七世纪），正式形成了寺院、政府、贵族三大领主的庄园（溪卡）体制^④。

^①东嘎·洛桑赤列，1985年，《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民族出版社，第35页。

^②刘忠，1991年，“试论西藏领主占有制的形成与演变”，吴从众编，《西藏封建农奴制研究论文选》，第17页。

^③《西藏自治区概况》，1984年，第236至238页。

^④牙含章，1991年，“试论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吴从众编，《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研究论文选》，中国藏学出版社，第52页至54页。

佛教传入西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松赞干布时期（公元七世纪），据说是由尼泊尔公主和文成公主介绍到西藏。在金城公主的儿子赤松德赞时期，佛教的传播有了大的发展并出现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批出家僧人^①。经过朗达玛灭佛的曲折之后，在公元十一世纪出现了宗教复兴，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纷纷创立^②。萨迦派是佛教集团中第一个政教合一的势力集团，后来在元朝统治者的支持下成为西藏宗教集团首次建立的直接统治全藏的政权机构^③。

公元十五世纪，宗喀巴大师创立黄教，在法王赞助下建噶丹寺并在拉萨创立传昭法会。但黄教首领（达赖喇嘛）与帕莫主巴王朝的法王和后来的第司政府之间时有矛盾，这种冲突导致了五世达赖请固始汗入藏灭掉藏巴第司政权。固始汗死后，五世达赖总揽西藏政教大权。他曾三次兼任第司（最高行政首脑），制定了僧官制，并拨大量土地和农奴给各寺庙，成为寺庙所属庄园，寺庙拥有独立司法权，这样就为黄教集团在西藏的绝对统治奠定了基础，最终完成了有比较完整的行政制度和法律的政教合一制度。

追溯西藏庄园农奴制形成历史和政教合一制度的发展史，可以说西藏的庄园农奴制与政教合一政体的发展在历史上大致是同步的。

黄教僧侣集团在争取西藏政教大权的过程中，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清朝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有可能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黄教集团在蒙古诸部中影响很大，扶持黄教可以利用其宗教影响促成和巩固蒙古诸部的归顺；第二，黄教讲天命，提倡逆来顺受、诵经拜佛以求来世，其教义有利于平息人民中的不满情绪，有利于封建领主的统治；第三，黄教戒杀生，不发展地方武力，有利于清朝对西藏的控制；第四，黄教首领并非世袭而是由转世产生，在确认转世灵童的过程中，西藏各僧俗集团之间存在着周期性的激烈斗争，难以发展成为统一和强大的政治势力，在确认灵童等内部斗争中各方往往要求助于中央皇朝的支持和裁断，这种情况有利于加强清朝作为中央政府的权威^④。

西藏的地理特点（高原和四周多高山）对于其生产力的发展和对外交流有不利的影响，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相对的封闭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⑤。由本教到佛教各教派，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在与政治势力的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僧侣集团逐步成为庄园主阶级和地方统治势力，这是宗教集团得以促成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产生的内在原因。而西藏与其它地区的相对隔绝和清朝政府治藏的方针政策，则是这一政体产生的外在条件。既有广大民众对于宗教的盲目崇信，僧侣集团自身拥有大量庄园和农奴同时在政教一体制下直接支配政府，再加上中央皇朝对喇嘛教的扶持，西藏的经济于是逐

① 《西藏自治区概况》，第118页。

② 原有吐蕃佛教称宁玛派。（《西藏自治区概况》，第109页。）

③ “由佛教上层人士担任西藏地方的宗教和政治两方面的领袖的政教合一制度，是从八思巴开始的。”（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第42页。

④ 黎吉生（H.e.Richardson）著《西藏简史》记叙1750年珠尔墨特事件时，也认为这一事件“使（乾隆）皇帝深信王位的世袭不会给西藏政府的安定提供坚实的基础。1750年的改革把宗教上层的政治统治置于永久地位。”（李有义译，1979年，第48页）。

⑤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50页。

渐演变成由寺庙（在相当程度上）所占有，被宗教集团控制、为宗教活动服务的“宗教经济”。

2. 1959年以后西藏形成“依赖型”经济的原因。

前文已详细分析了现在西藏经济形态的主要特点，但是这样一种经济形态是怎样形成的？哪些因素在其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如果我们认为西藏目前的“依赖型”经济需要有所改革，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明确今后努力的重点。

（1）首先应当说，中央政府指导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方针实质上就是赫克托的“扩散模式”，不过比这个理论的正式提出要早许多年。这个“扩散模式”在中国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符合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追求国内各地区“书同文、车同轨”的一致性，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爱搞“一刀切”。第二是中国传统上以中原文化为中心，认为中原文化发达，边远地区的“蛮夷”落后，所以讲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往往就是“赶上汉族”，谈到发展许多人想到的就是“汉化”。这是一种由于历史原因长期形成的但是在现代变得偏狭的发展观。

汉族在许多方面，包括教育、科技、工业等方面确实比许多少数民族发展得快，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既需要借鉴汉族地区发展的经验，向汉族学技术、学经营，也需要得到汉族的帮助，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宗教、社会结构、伦理观念与汉族不同，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环境也与汉族不同，学习汉族并不一定意味着“汉化”和抄袭汉族地区的全部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

追求一致性的“大一统”观念和偏狭的“汉化”发展观，是建国以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汉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扩散”到少数民族地区这种作法的理论基础。在工业基础薄弱、社会和经济组织发育程度不高、消费水平较低的少数民族地区，引入一整套汉族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建立与当地人口、生产规模相比十分庞大的行政与管理机构，按照汉族地区的模式发展一系列没有基础条件和严重亏损的地方企业……这一切绝不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财力所能负担的，所以这些作法很容易导致产生一种“依赖型经济”。

（2）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依赖型经济”的另一个理论根源是我国的民族政策。

“积极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建设，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衡，这是我国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一个根本任务”^①。在投资、建设项目、税收等许多方面，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始终很优待，用对“大民族的不平等……抵偿生活上（大民族与小民族之间）实际形成的不平等”^②。

从人力、物力、财力上积极帮助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事业，努力缩小小民族间的经济差距，这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照顾和优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也有可能产生某种副作用，即是逐渐不自觉地形成了少数民族地区在财政上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当这些事业未能发展地方上有生命力的、创造财富的生产活动时，很可能是地方上各项事业越发展，对中央政府的财政依赖越严重。

（3）我国建国后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产生和维持少数民族地区“依赖性经济”的制度保证。资金、物资、技术人员和干部都可以由政府的计划性指令在地区之间调拨和分

^① 《中国少数民族》1981年，人民出版社，第21页。

^② 列宁，1922年，“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论民族问题》（下），民族出版社，第867页。

配。同时，计划经济往往看重按上级计划完成分配的生产任务，对于经济效益则较少注重。

(4) 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虽然面积很大，但人口数量很少。近年来由于对少数民族在计划生育方面的政策很松，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1964年的6%增长到1990年的8%，达到9120万人。由于比例小，人口少，尽管政府对各少数民族地区长期给予大量的财政补贴，但仍然负担得起。这些钱分摊到汉族地区，每人的负担还是有限的。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小，中央政府能够负担得起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大量补贴，这也是造成“依赖型经济”的另一个客观条件。

(5) 历史情况的延续是造成西藏“依赖型”经济的另一个特殊原因。清朝时期达赖、班禅入不敷出的部分一直由清廷补足，战争赔款由清廷支付。1951年达成的“十七条协议”中有一条规定了“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后来撤销军政委员会，建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有关行政开支和筹委会组织兴办的各项事业也由中央政府负担。西藏“财政靠中央”也就逐步成了一种传统。

在我国既有长期形成的“大一统”观念，又有马列主义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加上计划经济的体制保证，客观上又能够负担得起，这样就在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各项事业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地区对中央财政的严重依赖。

3. 西藏1952年前后两种经济形态之间的联系。

在西藏，由宗教集团控制和为宗教活动服务的“宗教经济”是如何转变为完全依赖中央财政补贴的“依赖型经济”的？两者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吗？

首先，西藏的这两种经济形态之间的转换采取的是一种“大破大立”的形式，即是凭靠外力对原有的经济形态予以彻底的破坏。西藏的民主改革解放了百万农奴，剥夺或赎买了三大领主集团占有的生产资料，寺庙和僧侣集团失去了在行政权中的位置，原来“政教合一”的体制完全被废除了。这种对旧体制的彻底破坏，使得建立一种新体制在客观上成为可能。

其次，在西藏这种新体制的建立也有其特点。建立的新体制（无论就行政制度还是所有制而言）与原有体制完全不同，这个“大破”之后的“大立”是一个外部体制的移入。既不是在改变本地的社会条件后从新土壤中长出的新芽，也不是保留部分原有体制基础，再引入部分新体制，而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嫁接”，而是不考虑当地水土条件而引入外地品种的“异地移植”。由于它的生存难以从当地水土中取得必要的养份，只好人工把外地的养份源源不断地引进来。在西藏要发展工业，如果当地群众没有迫切的愿望和动力，当地既没有发展工业所需的能源、原料和基础设施，也没有从事工业生产所需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所建立起来的工业一定没有生命力并且严重亏损。

“大破大立”和全面引进、输血维持使得这两种经济形态之间的转换成为可能，但两者之间也确实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存在某种共性。最重要的共同点是两者都没有——或者说都缺乏——经济增值的追求，而把意识形态和政治考虑放在首位。原来的黄教集团和达赖喇嘛政府最关心的是宗教活动，经济生产是为宗教活动服务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偏重导致经济冲动的缺乏和生产的长期停滞。民主改革以后在西藏发展各项事业（包括工业）的主要考虑也是偏重意识形态，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变所有制、巩固中央政府的权威性、维护国家的统一，而不是在经济上如何提高效益、增加利润。这是两种经济形态之间最本质的内在联系。

当然，两者在共性之外还存在许多本质上的不同之处。1952年以前西藏的行政和经济的

体制，是靠农奴制来掠夺本地农牧民的产品，以维持农奴主集团的消费享受和耗资巨大的宗教活动。民主改革后各项事业和资金则来自中央政府，是经由计划经济体制从国内其它富庶地区“平调”来的。在财富的来源和取得的方式上，两者是不同的。

六、西藏与内蒙古的比较

西藏自治区的情况在中国是否独一无二？在多大程度上，西藏与其它少数民族自治区有着相似的经历？内蒙古是我国北部的一个重要的自治区，面积为118万平方公里，1990年的人口为2146万。把西藏与内蒙古的情况作一个比较也许会有助于我们理解西藏的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认识影响西藏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变迁的有关因素。

1. 历史背景

如同藏族一样，蒙古族也有自己的灿烂文化和辉煌历史。在元朝时期蒙古族曾统一了中国。由于他们后来被明朝统治者赶出了中原地区，在明代，蒙古族与汉族中原统治者的关系比后者与藏族要松散得多。由于蒙古族崇信喇嘛教，蒙藏两族的关系始终比较密切。满清统一中国后，内蒙古地区和西藏都在清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清朝对待各民族的政策长期以来是分而治之，禁止汉族迁移到内蒙古或西藏。^①

由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和沙俄在北方的迅速扩张，清朝政府开始实行“移民实边”的政策，允许甚至鼓励汉族迁入东北、内蒙古和新疆地区。由于清朝政府在内蒙古拥有很大的权威，可以派出“垦务大臣”督办放垦蒙古草原^②。1912年，在内蒙古的汉族达到了100万，超过了本地蒙古族的人数（80万）。当时清朝在西藏的权威由于未能有效地帮助当地政府抵御英国的侵略（1904年荣赫鹏入侵拉萨）而一落千丈，西藏达赖政府对汉族移民始终持反对态度，加上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差异和西藏的高寒气候，使得清朝末年进入西藏的汉族移民为数极少。

2. 1991年到1950年期间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原地区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外蒙古脱离了中国，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曾谋求西藏独立。由于内蒙古的地理位置接近中原和中央政府，已迁到内蒙古的汉族人口数目已大大超过蒙古族，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地域上设立了几个行省（热河、绥远、察哈尔）并置于政府的直接管理下。在1912年至1949年期间，内蒙古的汉族人口从100万增至530万。在这期间，中央政府与西藏关系冷淡，在西藏的汉人数目甚至有所减少。政治因素（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权的关系）显然是导致这一时期内蒙古和西藏在人口迁移方面出现不同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

3. 1950年以后的时期

自1959年起，中央政府恢复了在西藏的权威，社会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和取消了寺庙的传统权力。西藏的行政系统和其它机构以与其它省区（包括内蒙古）相同的体制设立起来。除了高原气候和交通困难（没有铁路）之外，西藏的大致情况与内蒙古相似。但如同前一个时期一样，自发进入西藏的汉族依然人数很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蒙古的汉族人口从1949年的

^① 余元庵，1958年，《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19页。

^② 《蒙古族简史》，1985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276页。

530万增长到1990年的1730万^①。

人们也许会说，西藏与人口稠密的汉族地区的地理距离远，内蒙古很近，是这个因素造成迁移情况的差异。我们可以用新疆来作另一个比较。新疆与内地的地理距离同样很遥远，可是在新疆的汉族人口从1949年的30万增长到1990年的570万。

西藏在政治、经济制度上与内蒙古和新疆一样，与内地距离与新疆相似；与西藏的情况一样，在新疆和人口稠密的汉族聚居区之间，也有大片地广人稀的区域以充当“缓冲区”，在与内地的宗教存在重大差异方面也与内蒙古和新疆一样（虽然前者是喇嘛教后者是伊斯兰教）。但迁入西藏的汉族人口不但少于内蒙古而且也少于新疆，解释这一现象的一个政策方面的因素是：中央在新疆有组织地建立了农垦兵团，动员了大批汉族青年去新疆。但是兵团人口只占新疆汉族人口的一小部分，大量迁往新疆的汉族是自发迁去的农民。由此可见，自然方面的因素（西藏的高原缺氧的地理条件）和西藏缺少农业资源是汉族农业移民很少迁入西藏的最重要的原因。

4. 内蒙古的经济与财政

对于内蒙古来说，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同样是至关重要的。1989年，内蒙古自治区区内总收入为28.7亿元，支出为55.8亿元，差额27.1亿元由中央补贴。但是内蒙古向中央政府（或是通过中央部委直接管理的煤矿、林场、企业，或是通过计划调拨办法）提供了大量无偿或廉价的煤炭、木材、矿石、畜产品等原材料，所以中央政府对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数字不能简单地用来衡量汉族地区与内蒙古之间的经济关系。如果把这些运出内蒙古的原材料按市场价格也计算在内，中央给内蒙古的财政补贴的实际数字比表面的统计要少得多。如本文前面所介绍的，西藏运往区外的物资数目很小，在这一点上，内蒙古与西藏之间不能相比。

内蒙古工农业生产的规模与西藏相比也存在着质的不同。1949年以来，内蒙古已经建起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工业体系（采矿、冶炼、制造业、电器、轻纺等）。1988年内蒙古人均工农业产值为986元，西藏仅为440元。在消费水平上，情况却又颠倒过来了，1988年内蒙古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为1641元（另外有213元社会福利费），西藏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为2739元（另有582元社会福利费）。与内蒙古相比，西藏生产得太少而消费得太多了。就总的情况来说，内蒙古自治区在经济发展和与中央的经济关系方面可以代表除西藏以外的其它自治区。

1988年中央给内蒙古的财政补贴按人口算为每人128元，给西藏的补贴是每人493元。同年中央财政补贴占各自治区政府开支的百分比如下：广西44.7%，内蒙古52.7%，新疆60.4%，宁夏63.3%，西藏99.8%^②。西藏对中央财政补贴的依赖程度大大高于其它自治区。而且由于西藏事实上并没有向中央和其它省区提供多少原材料和土特产品，所以不存在

①应当说明，增长人数中约一半是自然增长，另一半是移民。

②西藏的物价也许比内蒙古要稍高一些，但幅度不会高到内蒙古的167%以抵偿两地工资差额。

③潘纪民编《宁夏四十年》（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第143页；吉效德编《奋进的四十年》（新疆分册），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第286页；韦宗辉编《广西统计年鉴》（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第271页。

因原材料与制成品价格“剪刀差”在计算上吃亏的问题。西藏对中央财政补贴的依赖性与各
地自治区相比存在着质的不同。

七、“扩散——工业化”模式和“扩散——供给”模式

从赫克托（Hechter）提出的两种发展模式（“扩散”模式和“内部殖民主义”模式）
的分析思路来看，很显然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政策应当大致归类为“扩散模式”，而不是“内
部殖民主义”模式。这从内地与西藏自治区之间在财政、物资方面的交流情况可以看得很清
楚。我们可以说西藏在1959年以后各族人民已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力，内地的政治和经济制
度也已经“扩散”到了西藏。但这些制度在西藏运行的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而且最终导
致了一个“依赖型经济”。西藏的人均收入和福利已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城镇居民的收入
和全体居民的公共福利等则完全依赖中央的财政补贴。西藏因此很难被称作是“扩散模式”
的成功例子。现实世界中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往往比理论设想的要复杂得多。

“内部殖民主义模式”已经受到广泛的批评，而“扩散模式”似乎公认为是国家内部各
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的理想道路。回顾了西藏自治区三十年所走过的道路之后可以提出一个问
题：如果“扩散模式”在现实中没有达到预定效果，原因是什么？根据实例检验，这一模式
还需要作出哪些修订？

首先，“扩散模式”所含的内容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扩散，同时也是经济生产活
动的扩散，是边区的工业化，在这一过程中边区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与核心地区趋同并融
为一体。所以我们不妨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提问题：目前西藏自治区是否已真正融合成为中
国经济的一个部分？

西藏自治区的经济制度与内地基本相同，这是事实。西藏与内地各省和中央政府之间有
广泛的经济联系和经济往来，这也是事实。但是，（1）相同的体制，在西藏并没有组织起
相同的生产（规模和效益）；（2）经济往来基本上是单向而非双向的（资金和物资）；
（3）西藏真正的群众性生产活动（农牧业和近年恢复的手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以传统
的方式（与内地差异很大）在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能说西藏经济已真正成为全国经济
实体和运行机制（生产、流通、消费）中有机的一部分，因为西藏在全国性各项经济活动中尚
没能发挥与中国其它地区相同（或近似）的功能，西藏与其它地区经济融合的过程尚未完成。

赫克托在论述中提到“当边区开始投入到全国性的经济系统中之后，在其结构性联系方
面的这些变化应当导致（边区民众）理性化的、注重实效和一致性的新价值观”，“经济融
合将导致文化融合”^①。如果这一观点可以成立的话，目前西藏与内地在文化（语言、宗教、
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没有明显缩小这一事实，也可以用来反证西藏与内地尚未达到经济融
合。

一些学者在研究“扩散模式”时，以日本为例说明“落后的边远地区一旦进入全国性的
商业网络，近期内（边区与核心地区）不平等的情况（由于边区经济竞争力低）也许会加
强，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区域间的）平等将会实现，与此同时完成了（区域间的）经济融

^①M.Hechter, 1976, 《Internal Colon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
rria Press. 第28页。

合”^①。这是一个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制下的案例。西藏自治区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案例。在与内地发展经济往来的过程中，西藏由于其经济水平落后非但没有受到内地的剥削并不得不在竞争中逐步提高自己的经济实力以逐步扭转劣势，与之相反，落后地区的经济受到了中央政府的优待和保护。单纯从经济观点看，在交往中“吃亏”的不是落后的西藏，而是较发达的汉族地区。这种“保护和扶殖”政策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是经过一段时期的“输血”使西藏的地方经济在这种“温室”条件下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起来，最后走出温室自立地参与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还是“输血”成为惯例，发展成一个“依赖型”或“供给型”（从西藏的角度看是“依赖”，从中央的角度看是“供给”）经济？

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希望边区的经济能发展起来并减少财政补贴。这也是中央在西藏推动工业发展的原因。赫克托指出“工业化通常被认为是核心地区与边区发展密切联系的一个必要条件，在社会组织各个层次（伴随工业化）的变化过程将会减少前工业社会中各区域间的差异。”^②但事实证明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化道路往往是十分艰难的。在发展研究中，虽然不少人认为“一旦边区民族（及其传统型社会）接触到核心地区的现代文明，其价值观念和行为导向就应当开始转变”，然而这种情况恰恰很少发生。“从许多文化理论家的观点看，边区文化形式和习俗的保存是少数民族（对现代化）的非理性反应，边区民族寻求保存自己落后的生活方式，并力图与现代工业社会的迅速变化相隔绝。（因为）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感到）很舒服”。这说明文化差异和保守心理阻碍了边区与核心地区的经济融合。“一些人认为，如果传统和现代化做为两个仅有的选择出现在边区民族的成员们面前，人们很容易就会选择现代化”^③，事实上并不是这么简单。

在政治统一的这个前提条件之下，人们试图解释为什么许多国家的边区及少数民族极力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在经济上发展缓慢而且并没有与主体民族相融合。一种观点认为是文化因素（传统文化的差异）阻碍了经济融合，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融合的速度太慢阻碍文化融合，“为什么在现代化海洋中，（边区的）传统主义仍然可以幸存？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解释是：边区在事实上尚未与核心地区的经济相融合。”^④

从西藏的情况来看，中央政府在推动西藏的工业化和使其融合到全国经济中去这方面是做出了很大努力的。但是，如果两个民族在文化传统（语言、宗教、价值观念等方面）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在文化与经济这两个互动的因素当中，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在发展边区地方经济的努力中，资金和物资（中央的财政补贴）也不是万能的，有钱并不意味着在任何地方都能组织起有经济效益的生产活动。

内地的社会、经济制度“扩散”到了西藏，中央动用了大量物力、财力来推动西藏的经济现代化，但三十年的努力结果没有形成一个“扩散——工业化”模式，称之为“扩散——供给”模式似乎更为恰当。所以赫克托提出的“扩散模式”还需要进一步修订。在体制扩散这个大方向下至少可能有两种很不相同的结果：一个是扩散后经过竞争（也不排除政府

①M. Hechter, 1976, 《Intnal Colon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ria Press. 第29页。

②同上，第22页。

③同上，第23页。

④同上，第28页。

在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和扶植)实现工业化,可称为“扩散——工业化”模式(Diffusion-Industrialization Model);另一个是扩散后中央把边区在财政上完全包下来,最后发展成一种“依赖型”经济,可称为“扩散——供给”模式(“Diffusion-Supply Model”)。

西藏这个案例至少向我们提示:如果在历史上核心地区与边远地区在社会经济体制和文化宗教传统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采取把核心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扩散”到边远地区的做法,至少作为一个短期的社会转型战略是过于简单化了。除了政治和经济体制上的诸项根本改革之外,其它许多因素如宗教文化传统、关于现代教育和生产的知识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都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赫克托关于“国家发展”(National development)的定义在某些方面也需要探讨。如他认为“国家发展指的是这样一些过程,一个在一定地域内的国家,其特征是领土内的各部分具有相互竞争的经济、政治、文化,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转型进入一个整体的社会,它具有单一的、全面渗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全国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①”他的“国家发展”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从“经济、政治、文化”的多元状态过渡到一元状态的过程。但实际的社会进程也许没这么简单,还存在着其它的可能性。多元向一元的过渡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也许各方面发展速度是不同步的,而且也许最终不需要或不可能在三个方面都达到同一个水准。譬如政治可能是一元的、统一的,在经济方面核心地区与边区的差异或许会大一些,而文化方面(语言、宗教等)也许会长期保持一种“多元”状态。在某些国家的实际情况中,这种发展不均衡的“一元化”也许更有利于该国的政治稳定 and 经济发展。费孝通教授根据对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即是一例。

赫克托从理论上认为少数民族保存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语言、宗教、价值观等)会阻碍经济融合和全国性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美国本世纪前半叶流行的关于民族关系的“融罐”(the Melting Pot)理论。四、五十年代一些学者们已根据美国各城市实际的民族关系现状对这一理论提出质疑并提出“文化多元主义”理论,认为亚文化民族群体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现实,符合民主原则而且对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益无害^②。

赫克托则认为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各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居住地域和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系统)在研究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发展”方面不能作为典型案例,美国的民族关系及其理论在其它国家没有普遍意义,因为在美国不存在“核心地区”和少数民族的边远地区这种区域划分^④。但这并不能用来肯定“融罐”理论和否定“文化多元主义”在其它国家的借鉴意义。

我国政府自解放以来一直鼓励尊重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这一政策对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事实上产生了哪些影响,会导致还是延缓民族间的“文化融合”,“文化融合”对于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是否有进步意义,文化多元现象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全国的经济

①M. Hechter, 1976, 《Internal Colon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第17页。

②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4期。

③M. Gordon, 1964,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141页至147页。

④M. Hechter, 1976, 第18页。

融合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在社会发展理论中带根本性的问题只有在今后的调查研究中去进一步探索和总结。

八、结论

综合前面各部分的讨论情况，西藏与内地省区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和影响这一关系的主要因素可以概括以下：

(1) 本世纪以前，由于西藏与内地在行政、社会、经济等制度上很不相同，西藏以寺庙和宗教活动为中心的经济模式使得西藏与内地的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规模有限。但与内地的贸易对于西藏的生产和消费仍然十分重要。人员往来则往往受到行政限制。清朝治藏的主要目标只限于保持西藏与内地的政治统一。

(2) 西藏的地理状况（高寒缺氧、入藏路途艰难）对于西藏与内地的贸易、运输、人员往来特别是汉族迁往西藏具有很大的影响。

(3) 1911年至1951年期间，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疏远，外国势力在西藏的影响扩大并对西藏与内地的贸易有着消极影响。

(4) 在1959年以前，寺庙在西藏的政教合一政体中占有统政地位。喇嘛在总人口所占比重很高，他们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并且控制着政府。宗教活动耗去了西藏的大部分财富。1959年后，寺庙失去了其传统权势。随着近年落实宗教政策的各项活动，喇嘛在西藏社会中的影响有增强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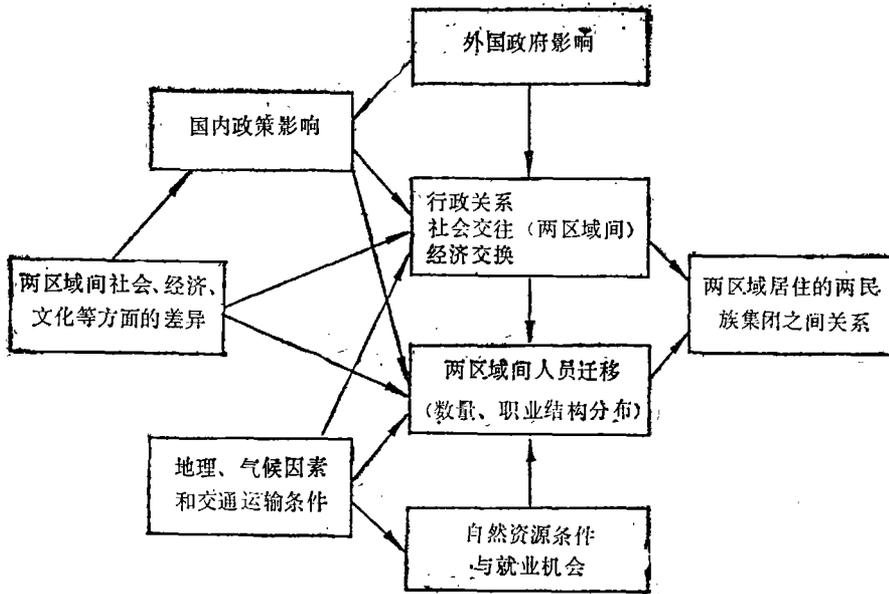
(5) 自1959年以来，西藏采用了内地的行政、社会和经济体制。虽然农牧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城镇中的国营企业却始终严重亏损。随着政府开支的增大，财政赤字也逐年增大，最后西藏自治区的财政开支百分之百地要由中央的补贴来支持。西藏的这种“依赖型经济”已成为西藏与内地之间关系的一个新因素。这种经济模式也使得中央政府限制进藏工作的人员人数和对内地与西藏的贸易规模实行计划管理。

(6) 作为常住居民的汉族在西藏始终只占总人口中很小一部分（5%左右），他们当中主要是一些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迁移由中央政府安排而且通常在西藏只工作几年。汉族很少迁入西藏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那里的高寒气候。近年随着改革开放新政策，自发进藏做生意的汉族个体经营者（贸易贩运、服务修理等）作为暂住和流动人口数目迅速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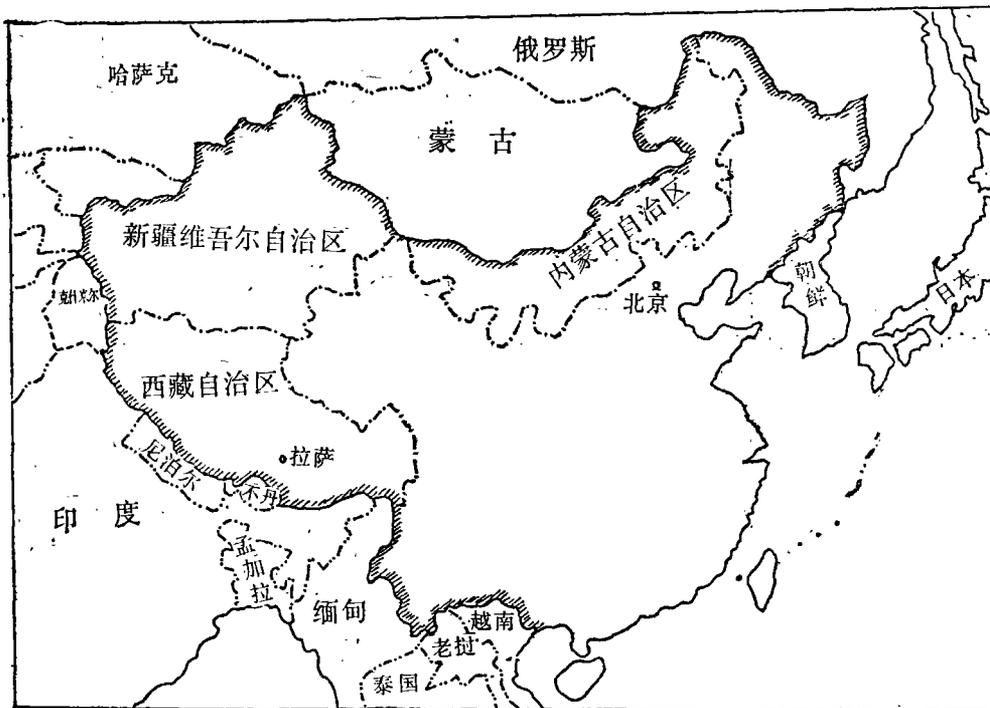
简言之，1949年以前西藏与其中世纪式政教合一社会政治体制相配合的是与宗教集团和宗教活动为中心的“寺庙经济”或“宗教经济”；1959年民主改革后西藏在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下发展成了一个“依赖型经济”。西藏的经济组织、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与内地省区的经济交流的规模、内容、以及汉族在藏人数与汉藏关系等所有方面，都受到西藏各时期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以其变化的影响。

西藏的两种经济形态之间存在着某些共性，其中最本质的一点是两者都把意识形态的考虑放在经济利益之上。两者之间的转换是凭靠民主改革的“大破大立”而实现的。新体制既不是“内生”，也不是“嫁接”，而是一种“移植”，在客观条件尚不具备、不成熟的情况下引进了内地的体制，并凭靠内地无偿调拨的资金（以中央政府财政补贴的形式）来维持这一体制。1959年以后，西藏的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但西藏与各省区的关系主要是西藏在资

（下转第18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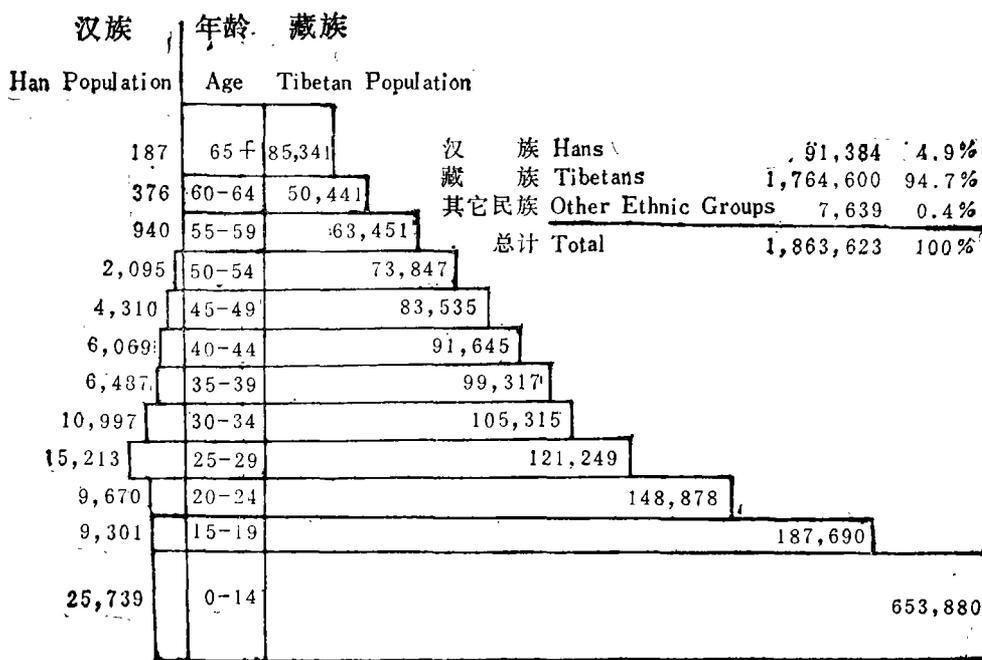
图一、影响两区域居住的两民族集团之间经济关系、人口迁移因素的分析模型



图二、西藏自治区地理位置示意图



图三、西藏自治区主要农业区分布图 (参见karan, 1976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p.fo)



图四、西藏自治区汉族、藏族人口的年龄结构 (1982)

表一 西藏自治区1959年耕地所有制情况

耕地所有者	耕地(英亩)	百分比(%)
地方政府	160976	38.9
寺庙、上层僧侣	152286	36.8
贵族	99317	24.0
西藏边沿地区的自耕农	1241	0.3
总计	413820	100.0

资料来源：《西藏自治区概况》，1984年，第253页。

表二 西藏山南地区各阶级户数、人口统计(1961年)

阶级	户数	占总户数%	人口数	占总人口%
农奴主、领主	152	0.4	606	0.4
农奴主代理人	1460	4.0	8611	5.5
富裕农奴	1195	3.3	8574	5.5
中等农奴	5412	14.8	34567	22.1
贫苦农奴	18413	50.4	74271	47.4
奴隶	7245	19.8	18251	11.7
牧民(未划阶级)	2327	6.4	10,064	6.4
其它手工业者	130	0.4	555	0.4
小商人	113	0.3	438	0.3
游民	104	0.3	510	0.3
总计	36557	100.0	156447	100.0

资料来源：同表一，第251页。

表三 西藏自治区主要经济指标

	1952	1959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88	1990
人口(万)	115	122	135	151	169	185	199	212	218
农业总产值(百万元)	183.2	184.5	338.2	358.8	435.6	579.5	716.5	731.1	789.0
粮食产量(万吨)	15.53	18.29	29.07	29.49	44.58	50.5	53.07	50.87	60.83
牲畜头数(万)	974	956	1701	1919	2117	2348	2179	2319	2251
工业总产值(百万元)	—	53.3	28.3	45.8	123.0	166.9	173.6	201.8	235.0
铬矿石产量(万吨)	—	—	—	0.03	0.02	5.03	1.41	7.21	9.31
原煤(万吨)	—	4.85	1.97	0.94	6.19	2.98	2.98	0.60	0.90
原木(万立方)	—	6	8	7	17	21	15	25	20
毛线(吨)	—	—	—	—	353	371	146	211	72
水泥(万吨)	—	—	1.06	0.36	3.4	5.22	4.67	9.48	13

资料来源：《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89），第63、84、218和233页；（1991），第81页。

表四 西藏自治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及构成

(单位：百万元)

	1978	1980	1983	1985	1988	1990
按用途、对象分：						
农业生产资料	62.9	73.9	48.0	150.3	80.6	193.0
浪费品	244.8	286.9	393.9	494.8	1062.4	1287.0
其中售给社会集团	34.8	37.0	55.4	198.7	445.1	400.0
按城乡分：						
乡村	142.5	165.1	229.2	501.9	478.0	710.4
城镇	165.1	195.6	212.9	598.2	665.0	769.6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307.6	360.7	441.9	1100.2	1143.0	1480.0

资料来源：《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89），第442页；（1991），第309页。

表五 西藏自治区国营商业购销总额

(单位: 万元)

年 份	从国内商业部门以外单位或个人购进	区外调入	国外进口	区内销售	调给区外	出口国外
1951—54	—	—	1313	2327	—	—
1955—59	1127	9445	2065	13128	79	73
1960—64	4740	34588	842	43944	2538	336
1965—69	4971	41158	764	59209	6279	312
1970—74	10368	61232	647	81149	8497	443
1975—79	25970	100101	1535	152648	13864	705
1980—84	29297	169262	3876	225859	10959	1858
1985—89	101545	227026	13569	315303	18699	13260
1990	58689	70175	8716	69073	4988	7479

资料来源:《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89),第426页,(1991),第314页。

表六 进藏、出藏物资运输情况

(单位: 吨)

进藏物资:	1960年	1965年	1970年	1975年	1980年	1985年	1988年	1990年
商业(消费品)	16300	17569	13000	27940	44700	42100	44039	37595
粮食	9053	16259	3510	13056	34700	30400	38051	95480
石油	19451	22547	18068	59407	79200	92300	97051	107880
统配物资	3452	10760	6600	26898	41500	77700	50301	87126
其它	14244	9465	940	23398	34300	231900	55197	34824
总计	62500	76600	42118	150699	234400	483400	344639	362905
出藏物资:								
土畜产品	—	—	1768	5631	4200	3300	2607	1399
铬矿石	—	—	924	—	22500	43800	57873	73908
木材	—	—	—	1566	900	—	34832	8987
其它	—	—	1602	19541	14900	19500	62092	17632
总计	—	—	4292	27630	42500	66600	157404	107746
出藏主要物资价值(万元)								
畜产品	158	1259	—	1499	1648	294	1067	92
中药材	95	273	—	333	707	602	353	1246

资料来源:《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89),第343、344、441、442页;(1991),第243、322页。

表七 西藏自治区历年分项目财政收入

(单位: 万元)

	1952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88	1990
本区收入									
一、企业									
1.工业	—	3222	124	-230	122	-537	-2647	-1945	
2.建筑业	—	69	-24	-69	-27	-74	184	-36	
3.农林水利气象	—	43	6	-1084	476	-1432	-47	3	
4.交通邮电	—	2773	-146	-1844	-2421	-3029	-1816	-640	
5.商、粮、贸	—	—	-221	-268	-3098	-1904	-6406	-4041	
6.其它	4	35	-83	-390	-174	-1596	-816	-2051	
小计	4	6143	-343	-3885	-5122	-8254	-11548	-8711	-14978
二、各项税收	137	1316	1208	1187	1953	2030	4544	6989	13694
三、其它收入	118	2360	881	556	184	251	967	1950	3093
四、企业折旧基金	—	342	493	—	—	—	—	—	—
本区财政收入总计	258	10167	2239	-2142	-2985	-5973	-6037	226	1810
中央财政补贴	1047	2725	11805	18345	29179	60104	105772	103077	124389

资料来源:《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89),第470、471页。

表八 西藏自治区历年分项目财政支出

(单位: 万元)

	1952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88	1990
行政管理费	712	1843	2899	2494	3873	7599	13249	19236	19647
文教卫生科学事业费	206	595	1268	1062	3430	7692	17099	26668	28651
支援农业支出*	22	262	531	524	2805	6130	10903	10573	13512
工、交、商事业费	—	1362	1452	1190	1785	1446	6077	5572	5829
城市维护费	3	24	39	100	50	273	1933	1221	1483
企业挖潜技术改造补助	—	1361	1452	1190	2012	2245	7148	6634	1054
基本建设支出	28	7510	3648	4619	8164	15716	34241	12901	14651
地质勘探费	—	172	114	192	1865	189	698	680	—
社会福利(包括青年就业)	2	26	192	104	249	1532	1391	2192	3619
价格补贴支出	—	—	—	—	—	—	2239	2901	5442
流动资金	—	2984	583	166	1220	221	190	30	—
民兵、防空费	—	—	—	—	94	171	115	136	173
其它	—	402	587	163	285	4834	13725	21595	35182
总计	973	15450	11313	10613	24026	46602	102941	104766	129242

资料来源:《西藏社会经济统计年鉴》(1989),第473-475页。

*“支援农业支出”包括农村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

表九 西藏自治区银行现金支出情况

(单位: 万元)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88	1990
1. 国家工资支出	1365	3692	4567	6635	15175	27552	31690	35294
2. 国家职工奖金支出	—	—	—	—	66	2061	1958	2675
3. 国家对个人其它支出	—	295	318	695	1889	9200	10878	12843
4. 部队存款支出	1084	3129	3888	3857	3789	7558	11516	21177
5. 城镇集体单位工资奖金支出	31	65	62	34	866	1656	1525	2256
6. 乡镇企事业支出	—	—	—	—	—	681	205	278
7. 城乡个体经营支出	—	—	—	—	—	207	807	3941
8. 农副产品收购支出	1258	2059	1697	1527	1226	3178	9094	8468
9. 农村信用社支出	—	146	208	1546	4612	6210	10246	16364
10. 行政企业管理费支出	199	1034	908	2110	3546	4512	5755	7755
11. 工矿产品采购支出	—	—	—	16	79	197	345	147
12. 储蓄存款支出	360	1116	1512	1671	3629	13438	23846	27551
13. 汇兑支出	16	64	15	122	296	1086	1552	1955
14. 其它支出	402	672	650	1652	2006	7199	14225	13030
支出合计:	4715	12272	13825	19865	37131	84735	123642	153734

资料来源: 同表八, (1989) 第482-483页; (1991), 第346页。

表十 西藏自治区的汉族人口

年 份	汉族人口	汉族在总人口 中的百分比	年 份	汉族人口	汉族在总人口 中的百分比
1956	17631	—	1984	76322	3.88
1957	2100~2200	—	1985	70932	3.56
1964	36700	2.93	1986	72340	3.57
1978	112569	6.46	1987	78804	3.79
1980	122356	6.60	1988	79871	3.76
1981	99873	5.37	1989	74989	3.47
1982	91720	4.85	1990	67407	3.09
1983	79650	4.12			

资料来源: (1) 同表八: (1991), 第126页。

(2) 刘瑞, 1989年《中国人口: 西藏分册》, 第140-141页。

供任何公开的帮助。但只要他们有人越界进入我方领土，那么，意想中的事情就会自动实现，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我们给予他们帮助……^①。

所以，愿与清帝国保持贸易关系，首先是恰克图贸易的俄国政府，虽然还没有放弃把土尔扈特人迁回来的打算，但却不准备因此而将与这个相邻帝国的关系搞僵。

(责任编辑：豪斯)

①苏联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列宁格勒)，全宗1264，目录1，档59，页26。

(上接第41页)

金、物资和技术管理人员等方面对内地的依赖性。

虽然1959年以后我国政府在西藏自治区的政策基本符合赫克托(Hechter)提出的国家发展的“扩散模式”，但根据西藏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这一模式需要进一步发展修订为“扩散——工业化”模式和“扩散——供给”模式。在我国的现行体系下，西藏的情况应当归类为“扩散——供给”模式，发展成一个“依赖型经济”。我国其它各少数民族地区也在程度上不同地在财政上依赖中央政府，但西藏可以说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西藏与内地省区之间的关系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且在历史上曾有过十分曲折的经历。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和不同分析思路，人们可能会得到很不相同的结论。本文只是试图利用现有的文献资料、统计数字和研究成果对1952年前后的西藏经济进行一些最初步的分析，用以理解西藏基本经济形态及其主要变化，以及在这个宏观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汉藏关系的发展和影响这一关系的主要因素。

(责任编辑：茫戈)

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1993年攻读

民族民间文学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招收工作圆满结束

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硕士学位研究生点，指导力量雄厚，专业方向齐全，涉及蒙古、藏、回、突厥语族诸民族及甘、青、新特有民族民间文化。1993年研究生的考试与面试工作已告结束，招收专业为民族民间文学(含民俗学)。6名研究生分别来自新疆、青海、陕西、河北等不同省区，都具有良好的基础课水平及专业知识。他们除参加了外语、政治及专业的统考外，还加试了民族语文。此前，西北民族研究所业已在1991年、1992年招收了两届研究生。据有关人士透露，今后仍将每年招收一届研究生，以培养民族学方面的专业人才。